 大洋洲的陆地总面积只有897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6%，是各大洲之中面积最小的洲。岛国零星地散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如同洒在蓝缎子上的水珠。大洋洲涵盖了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和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三大群岛，另外还包括澳洲、纽西兰和新几内亚。它的总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0.5%，是继南极洲之后，人口最少的一个洲。

       这个人烟稀少的区域，蕴藏了丰富多元的矿产，包括镍、铝土矿、金、铬、磷酸盐、铁、银、铅、锌、煤、石油、天然气、铀、钛等，还有大片热带雨林，以及可作为肥料的鸟粪。从18世纪开始，欧洲商人就开始到这里挖掘宝藏，商船一艘接一艘地登陆，通过文明和暴力，换取岛上宝贵的物资。

       英国、法国和美国，要么垂涎大洋洲丰富的天然资源，要么看重它优越的战略位置，透过殖民的方式，以宗主国的姿态，把当地的一切资源占为已有。迈入20世纪，不少岛国先后争取独立，如今尚有十几个地区仍在美、英、法等国的管辖之下。

       大洋洲人口以欧裔为主，约占70%，原住民占20%，其余少数民族则包括印度人、华人等。华人在大洋洲拥有超过150年的移民历史。19世纪上半叶，华人就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被欧洲公司引进大洋洲，从事农耕、矿产开发及建筑行业。有人说华工最早出现在大溪地，而今天落户大溪地的大部分华人已繁衍四五代，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并融入当地社会。

       自澳洲和纽西兰发现金矿之后，掀起了一波强劲的华人移民浪潮。华人前仆后继地涌到“新金山”追寻黄金梦，短短数年间，南太平洋的华人人口直线上升。白人开始感觉地位受到威胁，在政客的煽动下，排华情绪日渐高涨。19世纪末，澳洲与纽西兰效仿其宗主国英国，开始向华人移民征收人头税，甚至立法排华。因此，部分华人选择返回中国大陆，一些则到周遭岛国发展。这不仅造成华人家庭分裂，而且严重打击华人社会在当地的发展。

       二战后，华人在澳洲和纽西兰的处境有所好转。20世纪70年代，两国先后修订移民法，对各族高素质移民表示欢迎，因此吸引大批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华人移民涌入。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移民人数激增，如今已跃升为两国华人社会中的主体。

       现今，大洋洲华人人口已突破80万人，主要聚居在澳洲和纽西兰。华人在澳洲和纽西兰安居乐业，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崭露锋芒，成为少数族裔的楷模。美属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联邦的华人，多数拥有美国绿卡或美国国籍，生活安定。

       不过，在其他岛国，华人仍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由于当地物产丰富、商机无限，华人铤而走险，试图开创一片新天地。可是，经过长期开发，一些岛国的资源逐渐枯竭，一些则在独立后陷入政局动荡、经济衰退、治安恶化的混乱局面，使华人不得不重新思索去留的问题。更多时候，华人视这些岛国为通往澳洲和纽西兰的跳板。

       在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等，华人成了恶意排挤、暴力攻击、匪徒抢劫的主要目标。然而，不少华人坚信“富贵险中求”，于是继续留守落后的岛国，默默从事着杂货零售、批发、餐饮、种植、制造等行业，一点一滴地累积财富，以盼能早日携家带眷，前往安定的澳洲、纽西兰或其他欧美先进国家展开新生活。

澳洲（也称澳大利亚）是传统移民国家之一。在人口最密集的悉尼（Sydney）市，每4人中，就有一人在海外出生。自1972年“白澳政策”废除后，澳洲政府秉持“公正、平等、正义、宽容”的原则，积极吸纳新移民，充分展现出一个多元文化大国的雍容气度，逐渐成为移民眼中的乐土。

       今日的澳洲社会由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移民所组成。其中，以19至20世纪之交抵达的英国移民后裔，人数最多。其他的还有来自意大利、希腊、德国等国的欧裔移民，以及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国的亚裔移民。丰富的资源、高质量的教育、有容乃大的气魄，令澳洲成为移民国的典范。

       近20年来，澳洲的华人人数直线上升，如今已达60万人，超越了占澳洲总人口2%的原住民，增长速度令人咋舌。

       如今，华人已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而是在澳洲各领域崭露头角，绽放光芒。

   在华人踏足澳洲以前，流放于岛上的囚犯们，都对中国怀着无限的憧憬，认为那里遍地都是足以令英国也垂涎的宝贝。1791年，第一批悉尼的爱尔兰囚犯，居然以为穿越森林就能够到达中国而集体逃亡。后来，人们在悉尼周围地区发现了大量囚犯的尸骨。

       然而，曾经辉煌的中国，那时也开始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日趋衰败。为了生计，华人纷纷走出国门，有的便来到了荒凉的澳洲。

       出生于广州的麦世英被普遍认为是悉尼最早的自由移民。他于1818年抵达悉尼，在帕拉马塔（Parramatta）购买了一块地，经营一家名为“狮子”的客栈，并娶了一名欧裔女子为妻。1832年，麦世英返回广州，他在家乡呆了5年，直至1837年，再度踏上了悉尼这块土地。

       据说，第一个从事家具制造业的华人，是在1827年间抵达悉尼的。19世纪40年代末，悉尼有半数以上的家具，都是华人制造的，就连淘金时期盛装黄金的木箱，也大半出自华人木匠之手。华人制造的家具，价格低廉、手艺甚佳，无论是椅子、桌子、梳妆台、衣柜等，都经济实用，且风格独特，深受欧裔顾客所喜爱。

       从1840年开始，英国便停止向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输送囚犯，转而引进中国的劳工。

       人力公司须为每名华人劳工支付5至10港元，并且提供船票，条件是华人劳工必须工作满5年，而他们的月薪也只有3至5元不等。在当时，这群被称为“苦力”的劳工，大部分在船坞和码头工作，成为奴隶和英国囚犯的劳务替代品，终日手脚不停地辛苦工作。

       当第一批苦力的合约将满之时，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Victoria）这两个州属，便陆续传来发现金矿的消息。黄金，让贫苦的中国苦力们顿时精神大振，并且前仆后继地前去淘金。同时，消息也很快便传到了中国内地，香港商人于是纷纷组织船队，载着满怀黄金美梦的华人，乘风破浪地驶向号称“新金山”的澳洲。

       开采黄金的华工们大多来自广州西南一带的县镇，包括开平、台山、新会和恩平这4个县。后来，华工渐多，金矿场附近还出现了华人聚居的中国村。

       华工的居所，是占地约8平方公尺的人字形帐篷，设备简陋，生活不但清苦而且相当寂寞。那时候，法律限制华工携带妻儿同来，浩瀚的太平洋，将一家人分隔两地。不少华工都会在床头摆着香炉，以祈求神明保佑一家人早日团聚。

       在中国村里，有诊所、杂货店和代笔处，也有部分华人从商、务农，或从事理发业、洗衣业和饮食业等。空虚的生活使许多华工迷上了赌博，据说，当时的“白鸽票”赌博游戏，就是今日澳洲六合彩的前身。

       除此之外，华工们也建了庙宇，尤以关帝庙居多。每年举行数次的神诞庆典，期间，就连外地戏班都会飘洋过海来唱戏，戏曲因此成了最令华工们引颈企盼的节目。

       然而，华工们并不打算在这块荒凉地定居下来。许多人在打拼了几年之后，均选择返回家乡。尽管华人人口增长率已经放缓，在当地工作的华人依然受到白人的排挤。

       首先，澳洲的金矿工通过政治力量，将华人逐步从矿区赶走，双方经常为了争夺金矿而发生流血冲突，中国村也时时遭到欧洲矿工的破坏。事件越演越烈，警方终于派员保护华工，实则是为了将他们限制在中国村之内，还时常以征税为名，向华工收取保护费。1878年，澳洲的海员们进行集体罢工行动，以抗议船务公司雇用华工，进一步打压华人在当地的种种发展。

       1880年左右，新金山的金矿开始枯竭，有些华工返回中国，有些则留下来，转向杂货、家具、饮食及蔬菜种植业等领域另谋发展。到了1900年，西澳、维多利亚州以及新南威尔士约三分之一的华人都从事蔬果种植业。

       华人的园子一般都占地不大，所雇用的员工顶多是十名。小园主们栽种药草、番茄和各种绿色蔬菜，收成之后便直接送到市场去贩卖，或通过中介转售出去。不论是从事什么行业，华人都全力以赴，苦心经营，然而却总是招来白人的妒忌及不满。

       华人的菜园被指责使用粪便来做肥料，不但不卫生，而且臭气熏天；华人的居所，则因为环境肮脏及恶臭而遭人鄙夷。及后，随着华人移民人数的锐减，蔬果种植业也就开始停滞不前了。接着下来，澳州政府开始限制华人移民入境，并且禁止家具业主雇用外国劳工，导致华人家具业青黄不接，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那期间，华人社会以男性居多，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在乡间或城镇从事劳力工作的单身汉，文化水平比较低；二是人数较少的专业人士以及商人，他们多数娶欧籍女子为妻，一般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并且参与澳洲白人的社交活动。

       1901年通过的限制移民法令，除了禁止亚洲人入籍之外，那些没有豁免证书的外国人，均必须通过欧洲语文听写的测验，否则便不准入境，这导致许多不谙英文的华人都被拒于门外。澳洲各州和联邦政府先后实行了排斥华人和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在这项政策下，澳洲华人的人数不断下降，到了1947年，这里的华人仅仅剩下1万2000人左右。

       澳洲的移民政策，直至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转变。

       澳洲政府首先提供科伦坡奖学金，以协助东南亚国家培育人才，接着大开本国高等学府的大门，欢迎海外自费生的到来。于1950至1960年代间，不少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华人学生，都到澳洲的各所高等学府深造。

       1972年底，澳洲工党政府全面取消了“白澳政策”，自此，华人新移民犹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这些移民的背景复杂而多元，有者是来自中印半岛的难民，有些则是来自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富裕人家；前者被戏称为“船民”，后者则是“有船阶级”。

       从此，这批出身各异的华人，在这个移民大家庭里，展开了崭新的人生之旅。

当地银行早期特为不谙英文的华人，在钞票上印上中文字。  
前排中的方劲武（King Fong），是早期当地学校中唯一的华人。

澳洲现有约60万名华人，人数仍在持续增加。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主要集中于维多利亚、新南威尔斯两州。其中，有五成以上的华人聚居在悉尼、墨尔本（Melbourne）。一般而言，华人都以“家庭团圆”、“商业移民”、“留学生”和“难民”等身份，入境澳洲。

       尽管华人移民澳洲已有近200年的历史，然而澳华社会的壮大，却只有在近20余年间才出现。

       那些二战前抵达的老华人，多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子孙却在当地繁衍生息，占华人人口20%左右。自1960年代的科伦坡计划以来，澳洲已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留学或移民的首选。到了1970年代，有另一批华人以难民身份从中印半岛、东帝汶前来寻求庇护。

       1989年爆发了六·四天安门的风波后，数万名中国留学生获准留居澳洲。今天，这批留学生都已年届四五十岁，他们大多入籍成为公民，并以家庭团聚为由，将家眷都接了过来。这个中国留学生群体，如今壮大成为近20万人的队伍，在澳华社会占了最大的比例。

       来自香港的移民，多属商人及专业人士，大多于97香港回归前移民澳洲；至于台湾移民，主要是商人和文人，多是基于台湾政局的不稳定，而选择移居澳洲。

       澳洲的生活消费，比美国、加拿大等要低廉，福利制度完善，治安良好，令憧憬安逸生活的移民，趋之若鹜。更重要的是，这里成功摆脱了种族主义的掣肘，提供了一个让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宽容空间，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平等和自由。

* *19世纪末，大批华工前往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采矿，主要集中在名为史葛斯迪奥的小镇，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居所、碗碟和数座坟墓，已经成为相当珍贵的史料。而今，华工的遗址获得重整修复，并被称为“锡龙的足迹”，是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 *方劲武拥有“悉尼唐人街之王”的美称。1938年，他生于斐济，小时随着家人移民澳洲，自小协助父母打理生意，中学毕业之后便出任瑞田公司的总经理一职。他长期投身公益事业，并且极力推广唐人街的历史与文化，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侨领兼慈善大使。*

 在澳洲，上至政府、下至百姓，这些年来都努力纠正“白澳政策”时期被扭曲的种族观念。年届七旬的老华人，回忆当年在“白澳政策”下遭受的委屈：“那年头，白人都不愿与华人共用车厢。我们一上车，他们就避到其他车厢去。”

       人离乡贱，老华人只好安分守已，默默耕耘，坚信这个国家必有华人的容身之地，且深深寄望于年轻的一代。

       一切果如长辈所料，后代为华人争回了尊严。如今，他们口操流利英语，在主流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且以白领、专业人士及企业家居多。华人在短时间内成功创业、培育起优秀的下一代，令白人刮目相看。

       从1960年代起，华人逐渐跳出传统的行业框框。土生土长的华人和新移民，大都跻身中、上流社会阶层。华人当中，约17%是专业技术人员、11%为行政管理人员、12%加入了公务员行列。此外，从事商业、担任产业工人及体力劳动者占19%，从事服务业和体育、娱乐等工作的也不少。

       来自新、马的华人移民，一般是留学澳洲出身，专业资格受到澳洲政府的承认，英语流利，因此是失业率最低的华人群体。除医学界外，华人人数较多的行业，还包括大学讲师、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及企业经理等等。

       至于那些来自东帝汶、中印半岛及中国的移民，则以蓝领居多。其实中国移民一般也拥有良好的学历资格，但由于英语水平较低、学位不受当地承认，且缺乏工作经验，削弱了他们的竞争能力。于是，中国移民在澳洲担任劳工、机械技术员工、中餐馆服务生及厨师的很多。

       迈入21世纪，澳洲华人犹如破蛹而出的彩蝶，广泛活跃于政治、经济、科研、文化等领域。

       华人之中尽管打工一族很多，但也不乏自己创办公司的老板，他们主要从事餐饮业及食品杂货业等。

       此外，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的许多资本雄厚的华人企业家，多在从事中澳进出口贸易、品牌代理及市场开拓等生意。

       大洋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会长林见松指出：“许多富裕的华人，通过收购百货中心、发展旅游业或开办工厂，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华人在澳洲经济发展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贸易方面，更是居功至伟。他们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走势、语言、文化风俗等了如指掌，是双方最称职的中间人。除了在澳洲与原居国之间搭建起了健全的商业网络外，还吸引了不少外资注入澳洲市场。

       近年来，澳州当局更进一步增加了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数额，以致经营房地产、进出口贸易及投资设厂的华人越来越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使华人在当地社会的地位节节攀升。

       迅猛发展的中国展现了无限商机，深深吸引着澳州年轻一代华人。他们渴望抓紧时机，返回中国去创业、服务。有趣的是，当年祖辈们辛辛苦苦，千里迢迢南来，是为了美好的明天。如今，这群杰出的后裔却蓦然醒觉，明天的梦想，反而是在祖辈们的故乡。

有“悉尼小上海”之称的艾士菲（Ashfield）,华人商店生意红火，门庭若市。

墨尔本洪门民治党元老伍长然（左）和终生盟长雷谦光太平绅士（右），在1950年代抵达澳洲。他们牢记长辈的劝告：“人在异乡，要入乡随俗，遵守西方社会礼仪。”至今，他们仍恪守不渝。

 长期以来，移民海外的华人大多只顾埋头挣钱，对政治冷漠。当年白人提出了“白澳政策”，只有少数企业家及热心人士挺身而出奋力反击。来自越南的前联邦议员陈之彬认为，只有通过政治的参与，才能有效提升华人的地位。

       近几年来，华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困守在华族的小天地，自我孤立。于是，华人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华社纷纷出钱出力，鼓励有理想、有才干的年轻人，昂首步入澳洲的政坛。

       1998年发生的一项突发事件，成了华人参政的转折点。当年，澳洲某位议员和他的党派，发表了种族主义言论，指责外来移民严重影响当地人的生活，不但降低了就业率，还破坏社会治安。这种偏激的排外言论，马上引起当地移民的反弹，华人代表还高举反种族主义旗帜，并成立了澳洲团结党。团结党以各移民社区代表为主体，强烈反对种族主义，力主维护澳洲的多元文化。近3000名党员中，华人占了一半以上。

       创党人黄肇强医生是一位来自印尼的华人领袖。1998年，他赢得了纽省大选上议员的席位，是澳洲历史上首位通过自组政党取得议员席位的华人。他早年还创办过澳洲中国留学生福利会，为数万中国学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2006年，澳洲内阁出现了第一张华人脸孔。年轻的中澳混血女性黄英贤，出任气候变化暨水资源部长。幼年时黄英贤也有过遭排挤的经历，因此她坚信，唯有通过政治，始能替少数民族争取平等的待遇。此外，墨尔本市首位民选市长苏震西，当选为2006年度澳洲最佳市长。

       香港移民廖禅娥，是近期备受瞩目的华人代表。身为自由党华人会主席的她不但敢怒敢言，也积极筹备许多活动。她说：“大家只看风光的一面，却不晓得在这里从政的华人，需付出双倍努力，争取党的信任及重视后，才有参选的机会。”她渴望通过政治力量帮助同胞，即使阻力再大也不畏缩。

       相信有一天，随着华人经济力量的逐步壮大，他们也会在澳洲政坛上大展拳脚。

* *1988年3月19日，何沈慧霞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结果成功成为进入澳洲议会的第一位女议员。来自马来西亚的林顺发，则是澳洲首位担任领地政府厅长一职的华人，也是第一位进入政府下议院的亚裔人士。*

1985年建成的墨尔本华侨历史博物馆，是了解华族文化的最佳管道，馆内还珍藏着最长的舞龙。

  自从澳洲门户大开之后，各国华人移民从未间断，留学的、探路的、投资的，纷纷涌来。

       大部分华人，最终都会选择定居于此，能入籍更佳。人们笑称，拿了“袋鼠证”之后，一颗心才真正感到踏实。入籍澳洲的华人家庭，一般都过着有房、有车的小康生活，还享有政府提供的完善社会福利呢！

       澳洲也是一个教育天堂，父母们往往为了孩子的教育而迁居澳洲。

       华人说：“我们都在名校附近买房子，确保孩子能上最好的学校。”名校附近的房地产价格因此水涨船高。许多年轻华人夫妇，甚至在宝宝出生前就已经选好房子，为孩子定下长远、完善的教育计划。

       在澳洲的名校中，华人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且经常是名列前茅的优秀生。一个香港移民笑称：“年幼时，我老坚持自己是澳洲人，因为当时的同学、玩伴们都是澳洲人。升上高中之后，身边的朋友大多变成了华人、亚洲人，我现在以身为华人而自豪。”

       华人子弟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是父母们最大的骄傲。然而，他们的中文水平偏低，或干脆成了不懂华文的“香蕉人”，令父母感到困扰。

       早在1960、70年代，中文教育随着华人移民的涌入开始活跃起来，中文学习班的数量明显增加，正规的中文教育也开始发展。澳洲政府鼓励各民族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教育部已将中文等6种语言，列为优先发展的民族语言。换言之，各族学生都有机会在国立学府中学习中文。

       澳洲目前有近400所中、小学都开设了中文课程。另外，也有数百所的周末中文学校。若包括成人学习班和夜校都计算在内，目前学习中文的总人数，估计高达14万人。

       澳洲华社复杂，中文教育因此难以统一起来。目前，中文办学团体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中印半岛等地，有的是宗乡会、校友会，也有宗教团体等。至于中文教材，分为简体字、繁体字两大类，教学媒介语也有普通话和粤语之别。

       其中，中文教育历史会算得上是中文教育的代表团体。这个由教育人士组成的义务团体，编写了《中国语文》一书，将中澳文化融为一炉，让学生们倍感亲切、有趣。

* *华人在医学界的卓越贡献，早已经获得澳洲社会的肯定。澳洲最著名的华裔张任谦医生，于1984年成功完成澳洲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并荣膺“本世纪最伟大的澳洲人”之赞誉。在他逝世之后，为了激励后进，当地还成立了“张任谦心脏病研究所”。*

 目前，澳洲有大约60家中文媒体，数量在世界海外华文媒体中排行第二。不过，公开发售的报纸少于十家，其余皆是免费派送。

       《星岛日报》的专栏作者兼公关郑关红指出：“目前，澳洲中文报的总销量，只有20万份左右，中国新移民及年长华人是主要的读者，年轻人几乎都看英文报。”《星岛日报》创刊于1980年代。

       1989年左右留下来的数万名中国留学生，不只改变了华社的结构，也改变了中文媒体的运作方式。留学生们受到当地商家的启发，灵机一动，办起了以商业资讯为主的免费报纸。资深报人张齐清说：“免费报一出现，整个市场就乱了。为了生存，各报竞相压低广告价格，结果严重影响了报馆的收入。”

       由于竞争激烈，各报馆唯有降低开销。报社的编辑，一般得身兼记者和翻译，忙得不可开交。不少专栏或文艺版，都靠当地的文友、作家们义务供稿。

       近几年，免费的中文杂志也加入了竞争行列，令报业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老子》杂志总编辑黄肇聪表示：“市场不大，同行竞争很激烈，但我仍然抱持希望。”

       另一方面，中文电子媒体的发展日益蓬勃。90年代后期以来，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与阿德莱德，都开设了私营中文台，例如：2AC澳洲华人电台、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及3CW墨尔本中文广播电台等，可谓百花齐放。

       澳亚民族电视台是一个由社区发起的非营利电视台，成立超过十年，由华团及商家长期赞助。节目总监郑毅中说：“通过电视台，华人保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交流平台，非华人也能从中了解我们的社会。”澳洲华人几乎都收看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科技让澳洲华人和其他华人世界之间的联系、互动更显密切。

澳洲最大的唐人街位于华人人口最密集的悉尼市中心。街头竖立的牌坊，挂着“四海一家”、“中澳亲善”牌匾，向来访者友善地致意。

   澳洲人口结构复杂，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政府包容多元文化，鼓励人民保存民族特色，使不同地域的华人，带着原居国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背景，交汇于此。

       因此，华人的传统文化得以大放异彩。澳华社会的多元，尤其体现在百家争鸣的华人团体之中。

       老华人创办的宗亲团体，多属于联谊性质。许多会馆，成了退休会员打牌、聚会的所在。由于年轻人加入会馆的兴趣不大，各团体大多面临会员老化的问题。至于各地的新移民组织，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多姿多彩的活动，涵盖了经济、文化、宗教、教育、慈善等。

       标榜平等、自由精神的澳洲，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包容态度令人钦佩；尽管基督教的影响很大，但佛、道两教，仍是不少华人家庭的传统信仰。随着华人的增加，各种佛教团体如慈济、佛光会等的发展也日益蓬勃。其中，宏伟庄严的南天寺，还是南半球最大的庙宇呢！

       华人社团近年来除了欢庆中国的传统节日外，还举办中国电影节、香港电影节、赈灾募款活动及中国书展等。此外，侨社青年团还获得政府的援助，举办一年一度的达令港国际龙舟赛，意义非凡。至于商界、媒体圈最热衷的活动，则是一年一度盛大的“东方魅力小姐”比赛。

       逐步融入主流社会的华人，每逢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依旧热烈庆祝。春节来临了，各地的唐人街、华团以及华人聚居的地方一片喜气洋洋，热闹的节庆气氛弥漫在大街小巷之中。在悉尼及墨尔本，春节的唐人街必定摊档处处，摆卖着各式各样的传统年货。

       此外，每逢春节，悉尼的唐人街必举办大巡游及各色文娱表演，舞狮、舞龙、踩高跷不算，高高的舞台表演着话剧、小品、相声和中国武术，才真叫人叹为观止！至于墨尔本的澳华历史博物馆，更收藏着一条一年一度出巡的大龙，是墨尔本华人迎春的重头戏，往往引来排山倒海的人潮。

       墨尔本中华青年会总教练刘彪师傅笑言：“我的舞龙队队员，每人平均有1.5个学士学位，是文化水平最高的舞龙队呢！”

       难得的是，华人节庆的热潮也感染了当地社会，不但大型商场会举办春节宣传活动，就连澳洲邮政局，都随之发行12生肖的邮票来助兴，充分展现了“四海一家”的博大精神。

* *本迪戈华人于100多年前便开始进行舞龙的表演活动，当地人称之为“复活节山会”。此后，每年的1月15日复活节当天，都会由当地中华公所负责举办山会以及舞龙大游行。上百人舞动着长龙，穿梭于各主要街道，一路上人山人海，成为当地人十分企盼的一大盛事。由于拥有两条来自中国的百公尺长龙，所以，本迪戈也被称作“龙城”，当地的华人历史博物馆，更因此而被命名为“金龙博物馆”。*

慈济义工团队积极推广环保、文化、慈善活动。悉尼慈济执行长纪雅莹说：“我曾经问过我的白人邻居，华人和白人要如何才能成为一家人？邻居告诉我其实很简单，只要大家都爱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分别。”

墨尔本中华青年会总教练刘彪师傅。

澳洲不但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社会也是多元文化共存。各大城市尽管生机勃勃，生活的节奏却悠闲自在。挣钱不难、福利优厚、保障全面，是华人移民的天堂。

       华人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当澳洲人。」走出「白澳政策」的阴影后，澳洲对待各族的包容度令人感动。种族主义、阶级观念几乎销声匿迹，任何背景的华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过着平等生活。

       前纽省上议员黄肇强医生指出：「来到这个公平和自由的国度，已经不须在意自己是什么人种或来自哪里。把自己当成世界公民，不断去学习、去分享，用心去爱这个地方，才是重要的。」

 与西北的“巨邻”澳洲相比，纽西兰可说是个精致的小国。没有慑人的气势，但洋溢一股宁静祥和的气息。有人说，甚至是这里的动物也特别驯良。

       8世纪以前，它还是南太平洋上的一座荒岛，之后外来移民才为它注入生命和灵魂。最早登陆的毛利人在当地享有崇高地位，毛利文化更被视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纽西兰于184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47年独立后，由欧裔白人掌政至今，而白人自称“Kiwi”（意即纽西兰国鸟——奇异鸟），借以宣示“土产”身份。1987年新移民法令实施后，纽西兰成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不再坚持打造以欧裔白人为主的“白色纽西兰”，反而对亚裔移民大开迎宾之门。如今，亚裔群体显著增长，华人移民成为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纽西兰的农产品和乳制品享誉全球，近年来也开始发展科技工业，但活力仍有所不足。这个国家不算富裕，人民却将人道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人形容，纽西兰人以平民之身享贵族之福，在社会福利、人道支援方面，丝毫不比欧美先进国家逊色。

       生性淡泊者，认为纽西兰就是他们心中的桃花源；踌躇满志、向往精彩人生的年轻人，却嫌它过于孤寂、冷清，渴望到澳洲、英国等地大展拳脚。如今，纽西兰每年外流的国民，比抵步的移民还多。

纽西兰华人的移民故事，仿佛一条曲折的历史长河，从19世纪开始流淌。

       1842年，远道而来的王鹤亭，成了第一个登上这块陆地的华人。当时，身为服务员的他正随船来到纽西兰的纳尔逊（Nelson）。在此地定居了十年，并且取得了纽西兰国籍的同时，他也用本身累积的财富购置了土地和牧场，过着舒适的好日子。在他登陆20年以后，第一批华人移民才开始涌入纽西兰。

       19世纪中叶正是全世界均为黄金而疯狂的年代。对于历尽苦难的中国人而言，黄金象征着财富和希望。金矿在哪里，中国人就往哪里去。金矿所在处，都可以瞥见华工的身影。

       1866年，首批华工来到纽西兰的丹尼丁（Dunedin）。这批为数12人的华工被丹尼丁商会从澳洲的金矿带到纽西兰的奥塔哥（Otago）金矿工作。隔年，为数1000人的华工也陆续抵步。奥塔哥金矿曾经风光一时，并且吸引力大批淘金客前来挖掘，不过，当西岸发现了新金矿之后，矿工们于是便舍弃了奥塔哥。

       华工在这个遭人遗弃的金矿里奋力挖掘，可是在他们回乡所需的费用还未存够之前，矿源就枯竭了。这批华工大多数来自广东的珠江三角洲，番禺人则占了半数以上，而来自中山、四邑、增城及东莞的华人也不少。家乡的天灾与人祸，逼得他们只好抛下了父母和妻小，远渡重洋去圆一个衣锦还乡的梦。为此，他们四处借钱才凑足船费和人头税，大约需用上四五年的工资才能清还。

       在金矿枯竭了之后，华工纷纷涌到城市去讨生活。他们转行当菜园工、洗衣工或杂货店帮工，以赚取非常微薄的工资。他们牢牢记住启航前对家人许下“等我，回来团圆！”的承诺，默默耕耘，有的后来甚至当上了老板。

       二战是华人移民到纽西兰生活的一次契机。当时，纽西兰基于人道立场，大量地收留了战火中的各国人民。结果国门一开，迎来了第二波华人移民潮。在二战结束之后，政府又放宽了华人移民的入境条件，华人终于获得了定居的机会。接下来一系列有利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华人女性移居到纽西兰，标志着华人家庭与社会正式在纽西兰扎根。

       1950年至1980年间，是华人移民受同化的重要时期。1960年代，一万名华人当中有75%是土生华人，一半以上的年龄均小于25岁，非常年轻。到了1970年代，大部分土生华人只能说简单的华语，而华人社区领袖都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多半没有承袭华人的传统，有的甚至连春节都不过。

       纵然华人的特质以及传统文化正不断地流失，但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却显著上升，各个领域专才辈出，医生、律师大有人在，不再像先辈那样以劳力为生。1980年代以来，华人大多已跻身于中产阶层，接受良好的教育，且生活稳定。守法、低调又与世无争的态度，也为他们赢来“模范少数民族”的美誉。

       1987年颁布新的移民法令，再度迎来第三波华人移民热潮。在此法令下，华人可通过投资或一般移民（技术移民）的身份过来，只要住满了3年后，便可申请入籍。在1991年，华人人数激增至4万人，占总人口的1.1%，到了1996年，更达到2%。华人移民社会的背景更趋多元，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移民皆有，而纽西兰华人社会也日益呈现出年轻且充满活力的一面。

* *1866年，一名年轻的小伙子周祥从广东新会远赴纽西兰来淘金。后来他转行从事乳制品的生产和贸易，最终成了纽西兰乳制品的奠基人，并且还在《纽西兰百科全书》上留下了辉煌的史迹。*

奥塔哥古城区劳伦斯最早的华人营地，建于1867年。

  华人落脚纽西兰的历史长达百余年，但华人社会的形成却在二战之后。

       如今纽西兰有近15万华人，为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在1987年的新移民政策下，华人纷纷以投资或一般移民的身份，携带家眷，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斐济等地蜂拥而来。近年来，大量中国大陆移民以投资或留学身份登陆，形成了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二战前的老移民及其后代，只占华人人口的20%。

       气候宜人、平原广阔的奥克兰（Auckland），深受华人青睐，60%华人居在这北岛之城。此外，首都威灵顿、南岛基督城（Christ Church)、丹尼丁和其他城镇，也有华人落户。

       华人在纽西兰的经济发展四平八稳，但活力稍嫌不足。华人小商家、专业人士相当多，投资者只占小部分。在政治、文化、教育、媒体、社团方面，华人也有所表现，惟成绩平平。

       在这个恬静的国度，有的华人乐于返璞归真，享受宁静的生活；另一些则不甘寂寞，总惦念着北半球喧哗的世界，心中蠢蠢欲动。

       近几年，纽西兰人民流行出国发展，人人都喊着要“OE”（Overseas Experience，海外经验）。因此，有些纽西兰华人到了其它英语系国家，也有的选择回流祖国。他们说：“回流，何尝不是一种‘OE’?”

纽西兰政府于1987年打开国门，对亚裔移民奏响了迎宾曲。不少华人坦承，当时只听说南半球有个袋鼠之国澳洲，没几个知道纽西兰。相对而言，纽西兰移民的条件较宽松，还被形容得像世外桃源般。一名台湾人说：“当初听到这里环境不错，抵达之后才知道股市崩盘了！原来，我是来救灾的。”

       天底下果然没有白吃的午餐。

       1980年代，纽西兰政府为了重振低迷的经济，大胆地采取了让资金自由进出的策略。结果，温室里的企业，一时抵挡不了全球商海的滚滚波涛，上市公司纷纷倒闭，还因此引发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

       同一时期，“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却如日中天，展现亚裔族群在经济上的惊人潜力。这令困顿中的纽西兰眼前一亮，转念希望借助亚裔移民的实力，让疲软的经济起死回生。

       很多纽西兰人始终关注华人移民对该国的经济贡献。媒体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在纽西兰打造一座矽谷？”华人哑口无言。投资移民就一直背负着这样一个无形的包袱，来到这个南方新家园。

       他们内心清楚，美国的矽谷不是一日建成的。经济建设需要许多成熟的内部条件，要只占纽西兰总人口不足4%的华人去实现这个梦，犹如天方夜谭。纽西兰经济活力不足，有竞争能力的人才都外流他国，而留下来的，大多是向往那里的安逸生活。

       纽西兰根深蒂固的社会福利政策，牵绊着它走向自由经济市场的步伐。人民在完善的社会福利之下乐天知命，毫无竞争野心，热忧都投注在一些非盈利活动之中。拥抱当下的闲适生活、热衷户外活动的当地风气，与亚洲社会对工作的疯狂投入大相径庭。华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往往无所适从，很多人碰了一鼻子灰，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惊魂甫定的华人，大半都会选择购置不动产这种低风险的投资方式。

       当地华商对华人的心态及市场了如指掌，他们收购农场地皮，很多时候并非用于发展畜牧业，而是奇货可居，待价而沽。

       纽西兰的洋房，一般分为砖材及木材两大类，而华人最爱牢固耐久的砖材房子，几乎把奥克兰霍威特克区（Howick）的豪宅砖房给抢购一空，因此人们戏称霍威特克区“Chiwick”（意即华人豪宅区）。其他受华人青睐的住宅区，房子和地皮价格也连翻几倍。

       纽西兰白人社会对华人这种炒卖不动产的作法相当不以为然，坚持家园不该当作商品来交易。可是，一名华人地产经济商指出，如果少了华人的炒作，纽西兰的地产业很难发展起来。也唯有华人，才会在世道欠佳的环境下，仍然面不改色地买房买地。

       除了房地产投资，纽西兰也出了不少杰出的华人企业家，涉足的投资领域广泛。马

来西亚移民郑明贤，是奥克兰Tony Tay Group地产公司的执行总裁，近年来还与怀特克雷（Waitakere）市政府联手打造大型的影视基地，要把好莱坞搬到南太平洋；而中国大陆移民黄玮璋，则被尊称为“薯条大王”。他们跟其他默默耕耘的华人企业家一样，持续为纽西兰的经济带来新曙光。

* *纽西兰土产奇异果，源于中国，本名“猕猴桃”。为了畅销海外，纽西兰人为它取了“奇异果”这个充满当地色彩的名字。*

|  |  |
| --- | --- |
|  | 华人是纽西兰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黄皮肤黑头发的脸孔在街上随处可见。 |

  多数投资移民在纽西兰的经济条件是优渥的，但以一般移民身份到来的华人，仍需一份安稳的工作养活妻儿。一般移民中，以来自中国大陆者占大多数，他们大多拥有高学历或专业技术；而来自港、台、新、马的，则以白领专业人士如律师、工程师等为主。

       对一般移民而言，想要真正在纽西兰落脚发展，就得先学会放下身段。无论在原居国的地位和声望有多高，来到纽西兰，都如打落凡间的神仙，法力尽失。在当地透明公平的制度下，既有的人情和关系都派不上用场，人人都得靠实力来争取机会。大部分纽西兰雇主都很注重员工的当地工作经验，许多移民在原居国积累的工作经验，到了这里就无用武之地了。

       此外，英语会话、书写能力也是移民求职必备的基本条件。香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人移民，英语能力普遍较高，容易觅得合适的工作而顺利融入。反之，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移民往往被英文这一关给拦住，因无法有效沟通而求职不顺者大有人在。有些人只好屈就，选择一份低于自己的学历或专业资格的工作。不少刚来的华人移民因此深感受挫，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闷闷不乐。碍于面子问题，有些华人不肯放下身段，乃至长期失业，领着福利救济金聊以度日。

       中国大陆移民陈慧娟深有感慨地说：“新移民的心态很重要！既来之，则安之，该如何扬长避短，在这个环境好好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

       只有挥别昔日辉煌、欣然放下身段的华人，才能在纽西兰展开全新的旅程，拥抱新生活的挑战及乐趣。

   正所谓“投资风险高，打工发达难”，来自各地的华人移民，总有一批人选择自己当老板，开家小店，脚踏实地将眼前的生意做好。

       奥克兰这个城市在近十年来号称亚裔移民的天堂。华人的商店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四面八方的住宅区，令纽西兰冷清的市场展现出几许活力。有人说，华人到来以前，奥克兰还不曾如此热闹过呢！

       亚裔移民经营的商店排列在街道两侧，中餐馆和超市儿乎都被华人垄断。礼品店、服装店及洗衣店等，更是不计其数。

       纽西兰人或许仍未打从心底接受华人移民，但中餐的魅力却令他们无法抗拒。调查显示，有四成的纽西兰人都到中餐馆吃饭。一般餐厅每周营业5天，中餐馆却开足7天，为顾客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有些纽西兰人，还劝我们星期天就别开店了，这可是家庭日呀！”一个中餐馆老板笑着说。

       1980年代初期，中餐馆的菜单上找不到山珍海味，仅有几道简单的小菜。只要端出咕噜肉、宫保鸡丁、炒饭和炒面，洋人便吃得不亦乐乎。在当地，中餐是一种时尚，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生意火红的中餐馆，老板个个都赚得眉开眼笑。“当年一名员工月薪120元，客人平均一餐消费40元，算一算，中餐馆真是只赚不亏的生意啊！”华人老板补充道。

       到了80年代末，在广场内开设小食中心的概念，从澳洲传入纽西些。很多华人放胆一试，在广场的小食中心租个摊位卖中餐，结果大受欢测，使中餐迅速普及起来。随着华人的激增，中餐馆越开越多，选择也越来越多样化，从港式点心到北京烤鸭，一应俱全，但竞争也很激烈。

       当地华人笑称，从前带洋人朋友去喝茶，向他们介绍美味的点心；如今洋人则自己带着亲友，浩浩荡荡地来喝茶、吃点心。

       有人说，纽西兰仍欠缺一条正式的唐人街或一座正式的中国城，将华人凝聚起来。然而，华人就像风中的种子，落在哪里，便在哪里开花结果。不少唐人街，已在纽西兰的各个角落渐渐成形。

       一般华人聚居的地区，都会出现小型的华人商业中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通往奥克兰市中心的多明丽路（Dominion Road），当地人称之为“最长的唐人街”。大约六七年前，这条全长9公里的街道共开了近百家大大小小的华人商店，包括中餐馆、杂货店、超市、中医诊所、洗衣店、书店、按摩院及美容院等。

       来自中港台、新马的移民们，饱蘸着家乡的记忆和情感，描绘出这条街的轮廓。走在街上的华人，望着熟悉的中文招牌、品尝着道地的家乡味、耳际不时传来熟悉的乡音，恍惚间，乡情余绪在脑海中萦绕不去。

奥克兰这条“最长的唐人街”上，华文招牌处处可见。

1893年，纽西兰为世界首个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在这个南太平洋的“女儿国”里，就算是单亲家庭的母子，也能在政府的照顾下，悠然度日。2000年，纽西兰的国王、总督、总理、议长和最高法院院长5个官职，都由女性来担任。“女儿国”里的华人社会，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从前，华人男性移民把妻小留在家乡，孤身到纽西兰来打拼，当地华人圈子可谓阳盛阴衰；如今，男人反过来把妻儿放到纽西兰，而自己则留守家乡，使得当地华人社会出现阴盛阳衰的情况，这在30至40岁的华人移民当中特别明显。为了孩子，夫妻俩分工合作，丈夫在家乡负责赚钱，妻子则带着小孩远赴异国留学，展开新生活。

       纽西兰的华人女性移民，大都扛起“陪读妈妈”的责任，母兼父职，而且还得面对文化的冲击。在男人缺席的日子里，所有的压力都由女人一肩挑起，在全力照顾孩子之余，也必须处理所有生活琐事，往往为了家庭而牺牲了事业。

       一名母亲回忆道：“那时侯，女儿因为语言能力欠佳，遭社区学校拒收。我转身看到原本兴高采烈背着书包上课的她竟然哭了，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妈妈。”

       为了替孩子申请入学，妈妈们硬着头皮，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写信。填表格、咨询及投诉；为了接送孩子，不少原为路盲的妈妈，纷纷报考驾照，当起孩子的司机；为了减低开销，她们甚至连修水龙头，换灯泡、除草等粗活儿都亲力亲为，刻苦精神令人钦佩。

       缺席的爸爸们都到哪儿去了？原来，和妻儿分隔两地的爸爸们成了“太空人”，长期往返于打拼事业的家乡和远方妻儿的移居地之间。男人放不下家乡的事业，往往只在体假时飞到纽西兰与妻儿团聚。

       大多数的妈妈和小孩，居留满3年后都顺利取得纽西兰国籍，但“太空人”爸爸则因为逗留时间太短而申请遭拒。入不了籍的“太空人”苦笑道：“没想到，我突然有了‘外国’太太和小孩。”然而，无奈的爸爸们为了生计，还是得奔波于南北半球之间，而妈妈们陪着孩子，在等待及思念中度过悠悠岁月。

       “其实，很多妈妈撑到最后都倒下了。”负责为陪读妈妈筹办交流会、讲座及辅导课程的张晓君老师如是说。从分享中得知，很多妈妈因为长期操劳过度，把身子搞垮了；另一些则因长期单向付出而忽略了自己，孩子长大独立后，自己却失去生活寄托，社交圈子几乎等于零；更多的妈妈，因代沟而产生家庭冲突，与孩子相对无言，彼此渐行渐远。

纽西兰华人的生活，在中文媒体诞生之前，可谓十分空虚。

       店铺在傍晚6点左右打烊之后，回到家只能看看英文报或英语电视节目，这对英文程度不高的华人来说，既感吃力又十分乏味。遥想家乡的生活，晚饭后握着遥控器，一个个华文频道让人看得不亦乐乎，街角也随时都能买到中文报纸。华人叹息，移民后的生活犹如一潭死水。

       1991年，马来西亚移民苏文德在奥克兰发行了第一份免费的中文报纸《华页》；1993年，香港移民冯朗山则创办了南岛第一份中文报《基督城华文报》。如今，纽西兰各大城市的中文报，加起来约有20家，而中华电视网和它旗下的华语、粤语电台，也于2000年入驻奥克兰。

       中华电视网是纽西兰唯一的收费媒体，而所有的中文报都是免费提供。报纸刚出炉，就大叠大叠地摆放在中餐馆或华人超市的门口，供人取阅，看起来更像一份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传单，高素质的新闻或文章，少得可怜。

       一般来说，当地中文报并没有完整的编采队伍，新闻往往靠转载或翻译而来。当地报人多以商业角度出发，许多中文报都是大集团手下的产物，以自我宣传为主要目的。华人读者则视之如鸡肋，啖而无味、弃之可惜，反正免费就随便看看吧！

       第一个将中国杂志引进纽西兰的华人，是6年前才抵境的中国移民方华。如今，大部分华人超市都能看到摆满中国杂志的书架子。方华和太太不久前还在“最长的唐人街”开了一家中文书店。他坚信这么做，有一天必能“唤醒人们的阅读记忆”。他说：“看书需要时间和闲情。生活稳定下来的新移民，迟早会想念阅读方块字的乐趣。”

       然而，中文市场的前景，仍令许多人忧心忡忡。中文媒体的消费群多属年长的华人，以及抵步不久的新移民。他们处在过渡时期，仍须通过中文媒体来获取资讯。但对于土生土长的华人而言，孩子从小就接受英文教育，英文已成为多数华人家庭的母语。因此，中文媒体的存在已变得可有可无。

* *首都威灵顿仍住着很多广东老华人的后代。1986年，他们创立了第一所用粤语教学的幼儿园，希望广东话能继续流传下去。*

WTV属下的“新超凡”中文电台。

    华人移居纽西兰后，发现当地人的生活，不外乎每天有规律的朝九晚五、周五晚上到酒吧去聚聚、周末假日和家人好友参加户外活动，要不然就赋闲在家种花剪草、修修房子及车船而自得其乐。这种生活，令华人感到百无聊赖、乏善可陈。

       在没有夜市可逛、没有卡拉OK可唱的情况下，华人只好串门子、打牌、打高尔夫球度日。然而，也开始有人将剩余时间投入社区服务，造福人群。

       纽西兰秉持人道主义，尽管国家不算富裕，但福利、慈善事业却媲美许多先进国，这全拜人民的热心所赐。华人说，纽西兰人即使银行里只剩几十块钱，也不会将剩余时间用来兼职赚钱，反而会选择当义工助人。

       纽西兰人这份无私的精神，也深深感染了当地的华人。目前，约有100多个属联谊或业缘性质的华人社团组织，而倾向于社会服务的华人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各大教会、佛光山和慈济等，除了弘扬宗教精神，更肩负起宣扬中华文化及华教的重任。

       许多移民会将父母一块接到纽西兰来定居。为了帮助老人学习英语，促进沟通，香港女移民林爽创办了“语言交流园地”，召集导师教授英文。每个周末，在奥克兰的东区和南区，都有大约60名“老学生”准时到那里上课。

       除此之外，纽西兰的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也为华人移民提供实际而有效的帮助，成为新移民与当地社会沟通的桥梁。社区服务内容丰富，包括为华人提供当地的医疗与福利咨询、协助新移民找工作、开办中英文学习班等，协助他们顺利地融入大环境中。

       这几年，政府积极为各国移民打造一个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比如在政府部门安排亚裔工作人员，或提供语言翻译服务等，导致一些华人产生了依赖的心理，英语的学习也因此松懈下来。然而，那些好不容易熬过来的前辈，却会提醒新来者，不要只顾享受眼前的福利，应努力去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并规划未来。

南岛与北岛的佛光山，都设有道场。它除了是学佛修行之地，也开办中文班、静修班、太极班等。

师生们在“语言交流园地”学习、交流。

  融入，不能操之过急，它需要时间慢慢酝酿。

       2002年，纽西兰政府正式为“人头税”事件向华人致歉，并表扬华人对纽西兰作出的贡献。迟了一个世纪的道歉，老华人已经听不见，但对他们的后代却影响深远。

       纽西兰学者麦理祖（Nigel Murphy）指出：“许多老华人的后代，已经完全融入纽西兰。这之前，他们鲜少去思考身份、文化的问题，现在却开始寻找真正的自己。”他们只占华人人口的20%，散居纽西兰各处。“华人”的身份曾让祖辈们遭受无数的歧视和排挤，但今天，他们的后代却都自豪地说：“我是华人。”

       中华文化的实质内容是什么？他们的理解很简单：“那是我父母在家中保留的传统生活习惯吧！吃的、穿的，还有做人的道理。”组织家庭后，他们也将父母教导的一切传给子女。然而，在传承过程中，中华文化流失了多少，又保留了多少呢？

       在威灵顿，老华人的后代们在安居乐业之余，也不忘怀让中华文化延续下去。

       纽西兰精武体育总会主席余汉祺（Peter Yu），4岁随同父亲来到纽西兰，他说：“不知不觉我已变成了‘Kiwi’。但接触武术后，我开始学中文，爱上了中华文化。”在传授武术的同时，他更重视向学员灌输其中的文化精神。

       李小龙电影将中国武术带进了西方社会。其中，纽西兰白人对中国武术的痴迷，更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数十家华人武馆中，就有七成学员是洋人。精武体育总会每年在威灵顿的春节嘉年华会上的表演，总是引来满满的围观人潮。

       每逢周六早上，乐龄人士齐聚威灵顿华人文化与体育中心大跳健康舞蹈；星期天则是大人小孩参加、观赏篮球赛事的日子，气氛非常热闹。午餐过后，儿童舞狮队、成人舞龙队就开始排练了。虽然学员们对中文大多一窍不通，但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非常浓厚，也很坚持。

       年轻人受当地风气的影响，都很热爱体育活动。一个年轻华人说：“有一次在酒吧里看橄榄球比赛，纽西兰队胜出了，我也忍不住欢呼起来。那一刻，才深深感觉自己是纽西兰的一分子。”

       威灵顿华联会是代表老华人的组织，协助政府推广中华文化和教育，也在网站上发表关于华人社会的研究报告。近期，他们还组织了“香蕉人论坛”，让不谙中文的新生代，能在论坛上发表他们的意见。

       对年轻一代而言，“华人”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称呼罢了。在生活上，他们已和纽西兰人无异，通婚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在通婚家庭里，从外型到文化，华人的特质都不断地流失。有人说，老华人的后代是当地华人的少数群体，有朝一日，它会从这个国度里消失。

提到纽西兰的华人，很多人脑中马上就浮现叶宋曼瑛、黄徐毓芳、陈梅这3个女人的名字。他们无比的聪慧和勇敢，加上逼人的才气，广泛赢得纽西兰社会的钦佩，成了当地华人的骄傲。

       荣登纽西兰十大畅销书排行榜的《也是家乡》，刻画了8名纽西兰华人女性移民的故事，作者叶宋曼瑛博士，半生努力钻研学问，目前在奥克兰大学执教。这名杰出的华人学者，30多年前偕同夫婿从香港移民而来，还在新家诞下两个小宝宝。这些年来，她出版了不少跟华人有关的研究报告和书籍，也勇于站出来为亚裔社会说话，争取权益，时时勉励华人在意气昂扬的同时，也不忘抱持谦虚和体谅的态度，赢来华社及当地社会一致的好评及敬意，令人感佩不已。

       身为纽西兰首位华人内阁部长，黄徐毓芳这位奇女子，备受各方瞩目。她在香港成长，1974年随家人移民纽西兰，1996年初次参政，成功当选为首位亚裔国会议员，至今已连任4届纽西兰国家党的国会议员。2008年，她被任命为妇女事务部长。

       这些年来，她多次为华人旅游业者、餐饮业者、留学生和青少年争取权益，让华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她的任务不轻，既要代表华人，又得兼顾白人社会的看法，必须谨慎游走于两个族群间，让两者的利益取得微妙的平衡。人们说，在这白人主政的国家，一个华人女政治家能坚持下来，实属难能可贵！

       陈梅女士是一位宪法大律师，更是驰骋当地法律界的精英人物。1970年，父母带着6岁的她，从台湾移民到纽西兰。当时，她只认得“Elephant”（大象）和“Watermelon”（西瓜）两个英文单词。

       她在奥塔哥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青少年岁月，之后以骄人的成绩毕业于奥塔哥女子大学，并考获哈佛大学的法律硕士。1994年，她和前总理兼前工党领袖帕尔默（Geoffrey Palmer）合伙经营律师所，业务蒸蒸日上，她个人表现更是突出。纽西兰前总理克拉克（Helen Clark）在2002年代表政府，就“人头税”事件向华人道歉，陈梅正是背后有力的推手之一。

  不少华人移民都下意识将自己定位为纽西兰的局外人，对公共政策反应冷淡，不热衷于政治，始终抱着一种作客他乡的心态。

       但2008年7月5日，却是移民们值得纪念的一个重大日子。

       这一天，“亚洲反罪恶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亚裔移民们纷纷走上街头，齐声要求政府关注奥克兰日益败坏的治安问题。奥克兰的华语电台也推波助澜，强力声援。当天1万5000人的游行队伍中，仅华人就占了80%左右。

       新闻见报后，很多人惊讶万分。愤慨于治安的恶化，连向来沉默的华人也终于挺身而出了！游行队伍中以受害者居多，而游行队伍中又以华人的比例占多数，警方因此特别澄清暴力罪案与种族歧视无关。

       很多华人移民认为，政府应该为治安不靖负责，同时对受害者表示热切的关怀。另一些土生华人却说：“罪案每天都发生，为什么总要出动总理来安抚？难道一有罪案发生，总理都要逐个发言、道歉、安慰吗？”于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开始散播开来。

       在土生华人的心目中，他们和欧裔白人、毛利人等同于纽西兰子民，待遇应一律平等。但海外出生的华人移民，尽管有了纽西兰国籍，华人的身份却仍旧没有放下，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因此不同。

区议员黄伟雄表示，纽西兰华人的民族意识已开始觉醒。

 不论老华人还是新移民，都走过挣扎、学习与适应的道路，可一谈起融入问题，他们却沉默了。人在纽西兰，心仍流连在老家，这里只能是第二故乡。

       土生华人的心里深深明白，自己永消只能是「Kiwi Chinese」，而不会变成「Kiwi」。黄与白，即便再怎么相混，最多也只是淡黄色而不是白色。

       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逐渐成形，国家政策也一再强调公平对待每个国民。然而，在华人移民的心灵深处，「白色纽西兰」的幽灵，依旧似有若无地飘荡着。

       从「Kiwi Chinese」到「Kiwi」 ,似乎还是一条漫漫长路。

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西邻印度尼西亚，与澳洲北端相距约160公里。它由南部的巴布亚和北部的新几内亚组成，全境共有600多个岛屿，多数保留着原始生态，风光旖旎。其国土超过80%被热带雨林覆盖，林木、渔产、矿物资源丰富，金、铜产量居世界前列，可惜缺乏开发技术，经济发展始终落后。

       巴新国旗上绘有天堂鸟，象征独立、自由、幸福，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这里的社会秩序混乱，治安不靖，近40%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穷线以下，身居内陆的许多部落至今仍过着原始生活，与文明及繁华似乎沾不上边。

       然而，华人毫无畏惧，远渡重洋来感受它的神秘民风及习俗。转眼间，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已超过一个世纪，并开拓了无限商机，强大的经济实力叫人刮目相看。

根据史料记载，华人是从清末便开始踏足巴新的。

       在1884年，德国占领了新儿内亚岛东北部之后，陆续从中国海南、广东、福州以及新加坡招募了数百名华工到马当省（Madang）来开发烟草种植业。他们均为单身男性，从新加坡坐船，历时约两个多月才抵达巴新。华工每月领取极为微薄的工资，稍微犯了一点错，就会换来一阵鞭打。虽然生活凄苦，但是三餐总算有着落。

       19世纪末，2000多名华工陆续涌入，主要是来自广东省开平以及新会县。因长期营养不良，部分华工患疟疾而病逝，客死异乡者大约有上千人。由于德国管理员担心疫情爆发，于是决定迁都至马都比岛（Matupit Island），之后因为该岛面积太小，又迁至可可帕（Kokopo）。在1903年，德国政府开发了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拉包尔（Rabaul），并将它定为行政中心。

       3次迁都需要更多的华工到来建造办公楼、码头、房子、商铺以及教堂等。码头用了两年建竣，拉包尔埠因而逐渐繁华了起来。每个月均有两趟船从香港往返悉尼，并且途经拉包尔。此外，还有澳洲到日本的航线，连接横滨、香港以及悉尼，也同样会途经拉包尔。由于交通的便利，吸引了更多华人移民，他们大部分来自广东省及香港。

       根据老华侨的追忆，在德国人未到拉包尔之前，已经有一个名叫李谭德的华人在当地取得不俗的发展，至于他是如何到来，则已经无从考证。大家都称他“阿谭”，育有一名孩子、并且拥有一间大房子、一家商铺、一家酒吧以及一家造船厂，另外还有3名员工在外岛负责向土著收购椰干，生活富裕，饮食起居均有工人侍候。

       阿谭甚得德国政府管理层的器重。总督于1907年在拉包尔划出了17英亩地来租借给阿谭建屋经商，期限为30年，每年仅是象征式地收取100马克的租金。阿谭于是以招标的方式开放给华人承租，租金每年十马克。原本散居的华人便将商铺租了下来，并且开起杂货店，加上华人木工、技工、商家的陆续移入，此处聚集了约千名华人，唐人街逐渐成形。

       那时，唐人街的店铺仅是以木材搭建，再盖上瓦片屋顶。约有200平方公尺大小的单层或双层店铺，林立在尘土飞扬的街道，楼下一般都充当店铺，楼上则作为住家兼囤放货物的仓库。商品应有尽有，包括米、盐渍品、咸鱼，糖、面粉、香烟、手绢、香水、棉织品、刺绣、玉器及铜托盘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联盟委托澳洲管理德属部分的新几内亚岛。澳洲政府于是规定，所有于1922年1月以前抵达巴新的华人将可以成为永久居民，较后抵达的则只能作短期居留。华人不得与澳洲和英国人来往，不许进出游泳池，网球场，俱乐部等公共场合，处处受到欺压，地位极之卑微。

       1942年，日军轰炸巴新，结果唐人街毁于战火，妇女则被强征为慰安妇。二战结束后，巴新的管理权回归澳洲的手里，华人也获得了战争损失赔偿金，有的选择在马都比岛附近的椰园里重建家园，有的把孩子送到海外去留学。

       1949年，澳洲把巴布亚及新几内亚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华人均被限居在新几内亚，除非有签证或者特殊文件，才可以到首都莫尔斯比港。1965年，限居令被撤除，华人鉴于拉包尔的商业市场已达到饱和的程度，于是便涌到莫尔斯比港去寻找机会。

       1975年，巴新独立，澳洲政府让华人选择到澳洲，或留下并加入巴新国籍。当时，有传言指巴新即将陷入暴乱，许多华人担心自己的财产被掠夺、生命受威胁，于是决定举家迁往澳洲，致使华人人数骤减。

       与此同时，基于巴新货币比美金更为强劲，因而吸引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工一窝蜂涌入。他们大部分都在木材进出口公司打工，约满之后，部分人回国，有一些人则看准当地的勃勃商机，从东南亚一带输入了非常廉价的日常用品，开起百货、贸易公司，并在当地大展拳脚。

       从1980到1990年代，盛产铜矿的布根维尔岛（Bougainville Island）一直在闹独立，结果巴新经济直线下滑，货币贬值了近50%，当地许多华人开始打退堂鼓，纷纷将产业卖掉。所留下来的空缺，便逐渐由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顶上。他们一般经营快餐店以及服装批发等。

       华人看见机遇时前进，看见危险时后退，如此一进一退，已经在巴新构成了多个壁垒分明的华人群体，并且汇聚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经济势力。

巴新华人从不同的国家移入，形成多元化、各具特色的群体。根据各个社团的统计，巴新华人约有6000余人，占当地人口的0.1%。不过，根据民间的说法，巴新其实有超过一万名华人，其中以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居冠，多来自福清、开平及台山。

       巴新华人群体大致可分为土生华人、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马来西亚华人、印尼华人、菲律宾华人、新加坡华人。他们有着各自的社团，活动圈子也围绕着各自的社群，偶尔节庆会互相往来，平时的互动则非常少。

       华人主要聚集在首都莫尔斯比港，在莱城（Lae）及拉包尔也有少数华人。他们以经商为主，打工的较少，涉足杂货、零售、批发、餐饮、房地产、木材、渔业、二手车买卖等行业。

       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群体的华人所使用的沟通语言也不尽相同。老一辈的土生华人主要说英语及家乡方言，年轻一辈则只通晓英文。至于其他群体，则以说华语及粤语为主。

       华人移民巴新超过一个世纪，无论在经济或政治上都有亮眼的表现，至今共有4名华人授勋为爵士。巴新从蛮荒走向文明，从太平盛世走向治安败坏，华人亲身见证，无论是习惯或眷恋，他们还是默默留守着。

在巴新，土生华人从事批发业，中国大陆新移民经营杂货店及快餐店，马来西亚华人从事木材业，印尼华人从事百货业，新加坡华人从事汽车零件业，台湾人则从事渔业。这并没有任何强制规定，但各个群体似乎有种不言而喻的默契，在不同的领域里，绽放耀眼的光芒。

       开杂货店及快餐店是许多中国大陆新移民的首选行业。只要租个店铺，再办点货，即能把杂货店开起来，一家大小既是收银员也是店员，就连聘请员工的钱也可以省下。

       杂货店原是老华人及土生华人的天下，新移民也依样画葫芦，惟“以价取胜”的经营手法略胜一筹。前者难忍恶性竞争，加上当地局势恶化，货币贬值，于是将店铺脱售，转战其他行业，空缺顺理成章由新移民顶上。

       “经营杂货店太累了，从早做到晚，全年无休，压力又大。”曾经营杂货店的TST百货业创办人陈修镇当年专挑治安黑区开店，累积资金后转战百货业，如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莫尔斯比港土著集中区——韦盖尼（Waigani），也开起一排又一排的杂货店，主要销售日常用品、服装和电器。人潮络绎不绝，但偷抢事件却防不胜防，因此每家杂货店都备有保安和闭路电视。不过，杂货店老板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捉到窃贼偷东西，拿回货物就算了，并没有为难他们。”即使被抢被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免因小失大。

       开快餐店（Kai-Bar）是新移民的另一选择。快餐店大多聘请土著做厨师，卖的都是当地人喜爱的食品，包括煎鱼排、鸡排、牛肉、薯条、米饭等。一份套餐有两样配菜，份量特大，只卖7基那，深受土著欢迎。

       由于当地治安败环，餐厅及柜台之间通常会架起铁栅区隔开来。顾客在铁栅外点餐后，便会伸手到铁栅内付钱、拿食物，颇像在牢房里交易。不过，小心防范总比让生命或钱财暴露在枪口下好。

       老华人或土生华人靠着之前经营杂货店的根基，进军规模更大的批发、进出口贸易。他们进口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生意遍布巴新各大城市，有的甚至晋升富豪行列。

       马来西亚华人移民中，常青集团及TST集团的表现最为亮眼。前者于1980年代进军巴新的伐木业，迅速崛起成为该国最大的木材出口公司，掌控了当地70%的伐木活动，继而涉足百货、媒体、航运、船运及油棕等行业。后者则全力发展百货业，共有9家百货公司遍布巴新各大城市，和印尼华侨设立的Papindo百货公司分庭抗礼。

       在巴新，赚钱容易，老板却不好当。很多时候，华人老板都会聘请土著帮忙，自己只是扮演监督及管理的角色。由于当地曾发生土著员工杀死老板的事件，因此每当员工偷窃或犯错时，华人都不敢大声责备，深怕遭到报复。“当老板一定要忍，无法杜绝土著偷窃，只希望他们少偷一些。”中餐馆老板洪叔2003年开餐馆至今，深谙与员工相处之道，备受员工尊重。

       在巴新经商问题虽多，但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只要肯努力，就会有作为。“这里机会多，只要你勤劳，赚钱不难。如果眼光独到，开创独门生意，更是稳赚不亏。”已加入巴新国籍的二手车行老板吴世民曾多次离开巴新，试图找寻另一片天空，却屡屡投资失利，最终决定留下来发展。

       有人形容巴新是一艘沉没在海底的金船，只要肯费心挖掘，就不会空手而归。因此，部分移居到澳洲的土生华人逐渐回流，毕竟这里的竞争不大，加上天然资源富饶，前景备受看好。

 巴新原是蛮荒之地，既贫穷又落后，但生活却是一片平静。直到1990年，布干维尔岛宣布脱离巴新独立，自此，这南太平洋岛国爆发一场长达12年的内战，枪声划破天际，国内犯罪率节节攀升，太平盛世似乎遥不可及。

       “从前，一天24小时走在路上都没有问题。土著本性很好，很有礼貌。”台商协会会长吴福财回忆起廿多年前的平静日子。许多华人口中的巴新，就像世外桃源。

       一切已成为过去。如今，步入莫尔斯比港，只见街道两旁的商铺大门深锁，不看招牌根本不懂做哪一门生意。不高的建筑物筑起高墙，墙上围着一圈又一圈带刺的铁丝网，门口设有保安亭，四五名保安持着枪或木棍在站岗；到零售店购物，必须通过多重铁栅，向保安表明来意后，才准许入内。

       在这种恐慌的气氛下，公共建筑、宾馆、住家、购物中心，甚至是佛堂，都设有严密的保安措施。

       有华人戏谑：“不曾被抢劫，证明你在巴新待得不够久。”的确，这里的华人几乎都有被抢劫的经验。巴新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施松龄就曾有26次被抢劫的经历。

       盗贼猖獗，人人自危，因此围墙越筑越高，铁丝网越围越多，整座房子装有闭路电视，就连看门犬也养了好几只。从大门到住宅，短短几步路，至少装上3道铁栅、好几把大锁头，入屋前，还先把看门犬放出去，以策安全。

       这样日复一日，防范、警惕俨然已成了华人生活的一部分。

       房子四周被铁栅包围着，宛如一个大铁笼，巴新华人始终无法自在地到外头呼吸新鲜空气。“在这里，除了工作，就在家里，很少出去，跟在牢房里没有两样。”常青巴新集团会计师林华强在巴新工作了十多个年头，一言道出华人的困境。

       基于治安之故，华人的活动范围越缩越小，能去的地方只有俱乐部、超级市场、酒店及一些保安措施较完善的地方。

       有鉴于此，华人养成了早上开门做生意，下班打烊就回家的规律生活，尽量避免夜归。从前，闲暇时还会出外野餐、散步、健身，或深入穷乡僻壤参观土著的家园，或到海边游泳；现今，为了安全着想，周末或假日只能出海钓鱼、打高尔夫球、相约朋友聚餐或打麻将。

      巴新公路交通不发达，空运乃是国内最重要的运输方式。暴露在外风险高，华人担心成为抢劫的目标，因此出入都自己开车，绝不乘搭巴士或出租车；车窗都贴上黑纸，让外人无法窥视车内的情况，并备有武器，以防万一。

       华人开车出门，总是把车子开到目的地门口，下车后马上入内，不会在外多停留片刻。有时，他们会带着土著工人做伴壮胆，或随身带着对讲机，和保安保持联系，部分华人甚至还配枪自卫。巴新政府从2003年开始，停止发出拥枪执照，配枪者只能向原有的拥枪者购买枪械，一把手枪的价格炒到3万块基那，仍然供不应求。

       对此，华人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习惯了。”

       治安问题迫在眉睫，华人分享被抢劫的经验之余，也不忘指出巴新混乱背后美好的一面。“生活好了，时间过得快，没什么竞争，钱好赚。”在巴新生活十多年的中餐馆老板洪叔坦言喜欢这里的生活，即便其餐馆曾经被抢劫。

       停电问题也叫华人大呼头痛。一天停电四五次或连续停电两三天都曾发生过，因此华人家家户户都备有发电机，以应付不时之需。“只要下雨刮风，停电、停水、越狱，是一定发生的事。”华人打趣地说。尽管生活上充满缺陷，他们也总能处之泰然。

       在巴新，最舒心的莫过于饮食起居都有工人打点。请一名家庭帮佣每月只需200基那，华人家庭一般会请两三名工人侍候，下班回家就乐得清闲。“这里生活节奏慢，什么都不必亲自处理，凡事都有工人照顾，生活很轻松。”土生华人钟日生在澳洲生活，事无大小都亲力亲为，那里请工人每天要75澳币，差别如此大，难怪他对巴新的生活情有独钟。

       在巴新，华人经商，土著打工。土著每月仅赚取200至400基那，而务农的每天只能赚取5基那；华人大多是老板，月入数千不是问题。至于吃住，土著住的是简陋的茅屋，吃的是便宜的饼干或快餐，进出餐馆是种奢想；华人住大房子、开大房车，吃的用的都是进口货品，到餐馆消费动辄要整百块基那。无论是经济比重，还是生活条件，双方的差距都非常大，矛盾也逐渐浮现。

土著菜市场被视为罪案黑区，华人鲜少踏足。

巴新华人社会阳盛阴衰，华人男性孤身到来，在别无他选下，造就了许多华人和土著通婚的案例。

       会计师林华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娶了土著妻子。“忙工作，没有时间回乡结识异性，除非选择单身，否则都会娶土著女子。”他与妻子结婚13年，两人育有3个孩子，生活和乐融融。不过，他担心孩子受到当地不良风气的耳濡目染，于是狠下心肠把妻儿送回家乡马来西亚生活，宁愿独自留在巴新打拼，饱受相思之苦。

       华人和土著在生活习性、思想、文化方面存有很大的差异，因此难免会产生摩擦，处理不当的话，甚至引发家暴。不过，只要双方相互谅解，异族通婚的成功例子还是不少。

       “土著比较单纯，思想和华人差很远，摩擦一定有，不要硬拼，问题就能解决。”林华强对妻子不穿鞋子的习性偶有微言，但心底明白包容比抱怨重要，学会尊重妻子的生活习惯，彼此就能和睦相处。

       土著的原始共产文化“one talk”，也叫华人难以理解。这是一种亲友、同乡及同族间互利互助的制度。也就是说，亲友失业或没钱开伙，都可以上门来免费吃住；一家人只要有一个人赚钱，亲友都可以上门讨钱，共享资源。TST超级市场创办人陈修镇也娶了土著妻子，妻子的亲友时不时上门吃饭讨钱，只要不太过份，他都可以接受，否则就会下逐客令。

       混血后裔依稀还有华人的影子，至于他们的下一代，则长得和土著没有两样。他们不懂中文，只说英语及土语，没有中文名字，只保留华人的姓氏。对于华人的身份，他们感到自豪，对于华人的传统文化，他们却一脸茫然。

       在中餐馆打工的混血后代小林，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对自己华人的身份倍感自豪。小林透露，父亲曾带他回到香港生活，因此学会了中文。对于华人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尽管只有简单的聚餐，没有隆重的庆祝活动，但他如数家珍，甚至说得出每个节庆的由来。

       华人和土著妇女结婚，如果按照土著传统，是没有仪式的。两个人同居，怀有孩子后，丈夫就要给妻子娘家送上聘金或聘礼（bride price），如果华人没有这样做，日后就没有权力管教孩子。至于华人的传统婚礼，已经非常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教堂婚礼。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先辈来自同一个村庄，华人和华人通婚前，都会先做身体检查，以确保双方没有血缘关系。有趣的是，华人的对象通常是朋友的亲友，因此大家仿佛都有着微妙的亲戚关系。

* *华人和土著的后代被称为“半桶”，意思是水桶内只注入一半的水。这个带有贬义的叫法，表示混血后裔只有一半华人血统。*

   早期，华人为了让孩子学习中文，群策群力在拉包尔筹办了两间中文小学。一间是华侨学校，高峰期有百余名学生；另一间是天主教教会所办的养正学校，只录取天主教徒学生。两所学校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经营，默默为推广中文教育而努力。但随着华人人数减少，两校也改变办校方针，课程以英文为主，学生以土著占多数。

       虽然养正学校大部分的毕业生已移居澳洲，但凝聚力依然非常强。他们于2008年举办毕业生团聚活动，前后花了一年时间筹备，并获得约1000人参与的热烈响应。

       老一辈的土生华人主要沟通语言是四邑话及英语，而他们的下一代则只通晓英语及土语，中文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我们是华人，但家里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懂中文。”第三代华人陈布莱恩（Brian Chin）强调自己华人的身份，却连自己的中文名字也不会写，平时多以英语沟通。

       土生华人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不太在乎孩子懂不懂中文，毕竟孩子日后到其他国家发展，懂中文与否并非成功的关键。一般来说，华人子女在澳洲完成学业后，都不愿回到巴新接管家族事业或工作，即使在百般不愿的情况下回流巴新，也盘算着在最短的时间累积财富，然后撤走资金，移居澳洲。

       相较之下，新移民更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他们在家教导孩子读书认字，并且灌输华人的传统习俗，努力地在异国他乡传承中华文化。另外，他们也趁假期把孩子送回家乡学习唐诗宋词，加强对中文的掌握。

 巴新各个华人社群都拥有自己的社团，虽然各自为政，但同样是为了协助华人、凝聚华人力量。其中规模最大的要属中国大陆移民创办的巴新中国友好联合会。该会于2007年成立，至今共有1000多名会员，并在各大城市如莱城、拉包尔和蒙特哈根（Mount Hagen）设立分会。

       巴新中国友好联合会一直和中国大使馆及当地警察局保持密切联系，每当发生涉及华人的事件，都会第一时间获得消息，并提供协助。例如，华人不幸被枪杀，该会将安排死者家属前来，处理死者后事，或办一场追悼会。

       “土著没有户籍管理，即使犯了罪，逃走就没问题了。”会长施松龄提到当地警力不足，法制观念薄弱，因此每次发生事故，华人总吃暗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和警方斡旋，尽量协助同胞。

       每月8号，巴新中国友好联合会也出版一份两页的报纸，免费派发给华人，希望华人更深入了解国内外的新闻及当地的法律条规，包括如何申请工作签证、如何给员工支付加班费等等。报刊从内容选择到排版，都由会长一人包办，每月发行400多份，反应不俗。

       此外，该会还筹办一家私人医院，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借此修补和土著的关系。

       其实，在巴新中国友联会成立以前，当地有一个同样是新移民创办的中华总会。该会成立于2001年，原有300多名会员，大多数是杂货店老板。如今，会员人数降至百多人，每月也仅是靠聚餐联系。

       马来西亚华人也组织了一个以娱乐、慈善为导向的社团，每个月都有聚餐活动，偶尔还会相约打高尔夫球、羽球。该会每年都会举办高尔夫球赛及抽奖活动，为当地的中央医院筹款，2008年就筹获30万基那。

       土生华人则有一个国泰俱乐部（Cathay Club），成立于1950年。这个团体主要在青年俱乐部举办一些华人联谊活动，比如下棋、打牌、看书报等，但随着会员都移居澳洲后，就不再活跃。

       每逢华人传统节庆，各个社团都落力筹办活动，虽然庆祝仪式简单，多以聚餐会为主，但文化传承的意义更为深远。

       过往，华人或许犹如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毫无凝聚力；如今，各个华人群体自发组织社团，不但加强华人的凝聚力，对当地社会发展也贡献良多。

巴新华人当中，政治地位最高者非前总理陈仲民莫属。陈仲民是巴新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理。自1960年代涉足政坛开始，他曾两度出任总理，政绩辉煌。

       陈仲民是巴新土生土长的混血后裔，从外貌上来看，长得和当地土著没两样，却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他的父亲陈柏早年从台山到巴新谋生，后来娶了一名土著妇女，继而在那里落地生根。身为华人第二代，他自小在华校上学，接受中文教育的熏陶。

       小学毕业后，他到澳洲留学；大学毕业后返回巴新协助父亲经商。后来，他在政府机构工作，渐渐对政治产生兴趣，1968年当选为新爱尔兰省的国会议员，之后更创立了人民进步党。

       1980年，他被推选为总理，在巴新政坛上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届满后，他依然活跃于政坛，十年后卷土重来，于1994年再度出任总理。

       卸下总理职务后，他对政治的热忱没有减退，继续出任新爱尔兰省的国会议员，为民服务。他的长子也跟随他的步伐，当上国会议员。

  华人在巴新从默默无闻至发光发热，一路拼搏向上，实现了发财致富的梦想。然而，面对总是令人不安的局势，华人或留或走，都还是未知数。

       在这里，钱或许容易挣，但生命更可贵。许多华人因此选择离开。而留下来的，则仍抱一丝希望。

       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前方的路或许难走，但说不定能换来一个澄沏的未来。

巴新中国友好联合会举办元宵节联欢会，巴新总理（中）出席支持。

 所罗门群岛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由900多个大小岛屿所组成，犹如一串珍珠散落于海面。

       16世纪中叶，群岛被欧洲人相继发现，他们看见土著身上佩戴着金光闪闪的黄金饰物，以为找到了《圣经》故事中所罗门王的巨大财库，于是将它命名为“所罗门群岛”。二战期间，它成了美军、日军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1976年1月2日开始自治，1978年7月7日独立，成了英联邦成员国。

       岛上天然资源丰富，有铝土、镍、铜、金、磷酸盐等矿产，也盛产金枪鱼；而苍茫的热带雨林，更是该国主要的经济来源。人民理应过着富足的生活，但种族矛盾、贪污盛行，经济欲振乏力，人民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贫穷、落后、动荡，是外界对它的普遍评价，但生活在这“快乐群岛”的华人，或许对它绮丽的自然风光、新鲜的空气及纯朴的生活深深着迷，就算情况再恶劣，却始终不离不弃。

 华人移民所罗门群岛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

       在19世纪末，所罗门正沦为英属保护地期间，一家英国Levar Pacific公司由中国广东省招来一批华工，到当时的首府图拉吉（Tulagi）去服劳役。

       “父亲和叔叔刚来时，还看见一些华人厨师后脑蓄着辫子。”二手衣买卖店老板梁福枢回忆道。

       早期的华工均为单身男性，有的当厨师，有的当木工。那时，交通非常落后，英国公司于是给了木工一匹马代步，两只鸡作为家禽，还有两名土著负责帮佣以及料理家务，生活还算不赖。

       相比之下，土著的身份卑微，他们均视欧洲人或华人为主人，只要两镑就可被买下来当作仆人，卑躬屈膝地任由差遣。

       华工约满之后，获得准许乘船返回家乡探亲。回乡的路途极为遥远，费时40天左右。整整一个多月都在海上漂泊，十分艰苦。

       周惠英的丈夫黄彪就是利用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完婚的。黄彪于1930年代以华工身份到了所罗门群岛，回乡完婚后又独自回到所罗门群岛为生活打拼，周惠英则留在家乡。夫妻俩短暂分隔两地，为的是日后的相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夫妻俩失去了联系。

       丈夫音讯全无，周惠英却从不放弃，当时已怀有身孕的她咬紧牙关，通过不同的管道打听丈夫的下落。1954年，她带着儿子来到所罗门群岛，相隔20多年后，一家三口才终于团聚。

       那时候，黄彪在唐人街有家杂货店，聘请土著打工。夫妻俩忙进忙出，有时连吃饭也得边捧着饭碗边做生意，业余时间不多。

       物换星移，如今已94岁的周惠英在岛上安享晚年。只操家乡开平方言的她，慈祥的面容布满岁月雕琢的痕迹。她身体健康，日常生活都自已打理，从不假手于人。离开家乡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去，大半生都在所罗门群岛度过。

       二战期间，硝烟弥漫，图拉吉被摧毁，霍尼亚拉崛起而成为新的首府。战后，华人利用美军所弃置的建材，于市郊搭建了20多家简陋的商铺，所罗门群岛唐人街就初见雏形。有一些华人留了下来做生意，有一些则到其他的岛屿如吉佐（Gizo）和奥基（Auki）去寻求发展。

       不论是工作或是生活，华人总是离不开唐人街。他们主要是开杂货店售卖日用品，也有的开设面包店以及餐厅，另有少部分的华人靠耕种为生。唐人街的房屋往往是一屋两用，即前面是店铺，后方则是住所。

       大多数华人虽身为老板，但生活却不见得很轻松，每天得从早晨7点开工至晚上9点，或午夜12点才打烊。如此卖力地干活，全是为了能多挣一点钱，好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使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那时的业余活动并不多，也还没有电视台，只能收听电台，或观赏中文录像带。开店、关店、休息，是每日的三部曲，生活节奏千篇一律，但他们却鲜少有抱怨，或许是知足，或许是已经习以为常。

       所罗门群岛的华人人数一直都不多。根据记载，1976年仅有452名华人。随着所罗门群岛的独立，华人担心它将陷入没完没了的动荡局面，为保安全而纷纷移居澳洲，导致这里的华人人数急剧下降。直至1980年代末，伐木公司以及矿产开发公司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招来了大批的华工，华人的人数才逐渐回升。同时，此处容易赚钱的消息传回家乡，中国移民也就蜂拥而至，尤其是在1995到1998年之间，更掀起了一股移民所罗门群岛的浪潮。

       这里的居留期限是最多两年，期满之后可申请延长；住满十年之后，即可加入国籍，没有任何限制或条件。许多新移民正是因为相中这一点而纷至沓来。

所罗门群品华人目前大约有2000人，土生土长的不过300多人，其余的都是新移民。

       这里的华人大部分来自中国广东四邑（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大多已加入国籍。由于来自同一省份，华人见面都以粤语或家乡活沟通，让彼此倍感亲切。另有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地的移民，他们基于工作或婚姻而留在当地。

       先辈在霍尼亚拉市郊区创建了唐人街，华人世世代代就在那里经营杂货店、零售店、批发店、餐馆、超级市场、旅馆等，也有华人从事渔业及伐木业。专业人士不多，仅有一名会计师及一名牙医，有的则在政府部门工作。

       中华总会是当地唯一的华人社团，对于华人的大小事务总是有求必应。该会早期创办中文学校，后因华人子弟锐减，转型成国立学校，教学媒介语也从中文改为英文。

       经过一番努力打拼，华人大都有房子、车子，更在国外置业，为将来铺好路。当地的业余活动不多，下班后在家休息、聚餐或上赌场碰碰运气，周末则相约到海边烧烤或野餐，生活既轻松又自在。

       然而，两次的骚乱，打乱了华人的平静生活。恐惧挥之不去，华人看清现实，处事比从前更谨慎，未来该何去何从，早已心里有数。

所罗门群岛地广人稀，物资匮乏，没有重工业，商业活动不多，约90%的华人经营杂货店。土生华人大多继承父辈衣钵，经营杂货店，而来自广东四邑的新移民也依样画葫芦，复制一家又一家的杂货店。他们从中国大陆、香港及新加坡进口食品、电器及日用品，不但满足了土著的日常需求，也温饱了一家人的生活。

       “杂货店容易做，即使一句英语也不会说，都可以把杂货店打理得妥妥当当。”新移民麦彩云起初在亲戚的杂货店打工，累积了资金及本钱后，就自己开起杂货店当老板。杂货店成本低，回酬高且快，只要组货、办货，再聘请工人，就能投入营业。

       然而，随着店铺增多，货品大同小异，竞争变得更激烈，找生活比从前困难。“以前一家杂货店，可以供养3个孩子到澳洲留学，现在即使有4家店铺，都无法供养一个。”很多杂货店业者都有类似的感叹，显见在僧多粥少的环境下，经商压力不小。

       土著经常无故缺勤，因此每家杂货店铺至少聘请4名员工，以防万一。店内，土著干着粗活，华人则打起精神，或坐或站，在柜台一边监督，一边收钱。“工人有偷窃的习惯，只要稍微不留神，货品随时被偷。即使对他们再好，他们还是习性难改，差别在于偷多偷少而已。”杂货店老板异口同声诉说相同的遭遇，脸上尽是无奈，只要不过火，他们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生意比从前难做，又要防范工人偷窃，华人肩上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但为了生活，他们只得默默承受。遗憾的是，一场大火吞噬了唐人街，毁掉华人大半世纪的基业。

       事过境迁，火舌的痕迹依然存在。踏入唐人街、映入眼帘的是唐人街牌楼，刻在上头的“唐人街”字样因年久失修而斑驳陆离，再望向坑坑洼洼的道路及遭大火烧毁的店铺，整条街满目疮痍。昔日，这里是土著及欧洲人购买日用品的首选之地，人流极旺；如今，几十家华人杂货店形同废墟，硕果仅存的8家，处在其中，有几分孤寂。

       华人不惜背负债务，在原址重建商铺，以期东山再起。重建工程如火如荼进行着，商店有两层楼高，全用混凝土打造，店面的空间规划比从前好。每家杂货店在摆设及格调方面不相上下，招牌中英文并用，门口立着几根柱子支撑屋顶，陈列架子用木板隔开，售卖食品及日用品居多。经过暴乱的惨痛教训，如今铁栅取代了板门，窗口也加设了铁花，保安措施比从前严密，以防历史重演。

       表面上，华人的生活已恢复平静，但从店铺朴实的装潢及存货数量的多寡看来，他们的心态已悄悄起了变化。“心里还是有阴影，担心再次爆发骚乱，考虑着是否要扩大生意。”经营快餐厅的郑爱莉仍心有余悸。

       华人一直把所得收益用作扩充生意，经此一劫，他们开始学会兑换外币保值，并逐渐转移到外地投资。

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绝大多数从事伐木业。所罗门群岛热带雨林丰富，该国政府划出27%的面积供砍伐，其余的都是保留地。马来西亚伐木公司所占的比例最高，共有50多家，另有一家韩国、一家澳洲、一家菲律宾及一家当地公司，竞争非常激烈。

       然而，伐木业的前景并不乐观，当地人对它更是又爱又恨。爱，皆因所罗门群岛60%的经济收入来自伐木业；恨，则因毫无节制的砍伐活动，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土崩、山洪等天灾频繁。此外，政府制订了更严苛的伐木条规，伐木业可说是前景堪忧。

       “这是一门夕阳行业，随着热带雨林减少，或许再过十多年，伐木业就无法继续，前景暗淡。”马来西亚驻所罗门群岛荣誉领事许如经在该处从事伐木业20多年，见证伐木业从昌盛走向衰退的过程。纵使困难重重，他还是会继续做下去，毕竟雇用工人太多，不能随意结束生意。

       这里长期动荡，经济落后，做生意却异常有赚头，可是在浩劫阴影的笼罩下，华人只好静观其变，步步为营。

“生活简单、悠闲、离开了不适应。外面的步伐太快，追不上了。”离开了又想回来，相较于外面的繁华世界，华人早已习惯这里的从容不迫。

       每逢周末或假日，华人常相约打牌、聚餐、郊游、野餐、钓鱼或打高尔夫球。有的则到赌场去一展身手，生活轻松又自由。“上班下班，就这样看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华人总是这样说，不疾不徐的生活节奏，他们乐在其中。

       周末清早，华人一家大小到餐馆吃点心，场面特别热闹。华人聚集在这里用餐，很容易就碰见熟朋友，挥手打招呼或点头示意是少不了的。一壶浓茶，几客点心、包子，在闹哄哄的餐馆，不单满足了口腹之欲，还可与好友、家人欢度美好时光。

       “在这里，不必买漂亮的衣服鞋子，简简单单，唯一的开销就是饮食。”来自香港的司徒洁华，挥别花花世界，在这里感受第三世界的朴素无华，一脸悠然自得。

       该岛四季如夏，华人一般都是衬衫短裤搭配拖鞋，打扮极为朴素。他们对品牌也不太讲究，名牌服装、鞋子或包包必须出国才能购买得到。

       平日，华人一日三餐基本在家里解决。早餐是面包、谷粮加牛奶，午餐及晚餐则以中餐为主。偶尔，华人也会烹调石头餐，即土著特有的土餐（Motu）——以香蕉叶包扎肉类，然后堆放一块又一块烧热的石头，大概焗四五个小时，就可享用。肉类夹杂香蕉叶的芬芳，再配上香料，口感极好。这里海产丰富，华人的菜肴中，总少不了一两道海鲜，而一般贵得令人咋舌的龙虾，在这里却异常便宜。

       华人只在周二及周四光顾土著菜市场，其余日子则会上超级市场，因为土著只在这两天到菜园及果园收割，蔬果相对来说比较新鲜。土著菜市场应有尽有，无论青菜、水果、海鲜，价格都非常便宜，而且不含农药、鲜甜多汁的凤梨和木瓜最受华人欢迎。

       “前铺后居”是唐人街房子的特色，下班后走一小段路即可返回住所，非常方便。另有华人住在半山区，独立式的高脚房子，从露台眺望，山下美景尽入眼帘。一套沙发、一张餐桌、一幅对联，是华人房子少不了的摆设，隐约透露出华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停电、疟疾肆虐是这里的生活缺陷。

       停电是岛上常见的事，曾经有过三天三夜停电的经历，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作息。因此，餐馆、旅馆及赌场都备有发电机，确保停电不会影响日常运作。不过，由于发电机和燃料价格高品，部分华人无法负担，只好默默承受生活上的不便。

       疟疾恐怕是华人健康的最大威胁。“不曾患上疟疾，就不算住在所罗门群岛。”据说，每天傍晚6点是蚊子肆虐的高峰时段，华人都尽量避免出门，不得已的话，就穿上长袖衣和长裤，而窗户也装上细密的铁网，房间则装上蚊帐，还有各式各样的驱蚊器。

       或许感染了土著乐天的个性，华人没有半点自怨自艾，反而将生活的种种缺陷看作人生体验，因拥有身边的一切而感到无比富足。

       唯一让华人萌起离开念头的是当地医疗设施落后。对退休人士来说，离开是情非得已的事，他们担心上了年纪病痛多，若移居到澳洲或其他先进国家，便能获得更好的照料。因此，大部分华人都在悉尼（Sydney）或布里斯本（Brisbane）置产，一来可供养老，二来万一这里再次动荡，至少还有个避难所。

在华人的印象中，所罗门群岛未独立前，治安好，鲜有抢劫或破门行窃等事件的发生，生活节奏缓慢，工作负担不重，人民和睦共处。然而，独立后，经济走向衰退，民不聊生，华人愈发怀念那一段美好时光。

       2000年爆发种族冲突，主岛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及马莱塔（Malaita）隔岸开火，华人惨遭牵连。瓜达尔卡纳尔岛民从军火库盗走枪械，然后向各大企业索取开战经费、征用车辆，有时还冲入杂货店掠夺食品。“那时候情况非常混乱，治安败坏，他们拿着枪到公司来要钱，名义上说保护公司安全，实际上是威胁勒索，同时还抢了我5台轮驱动车。”曾遭勒索的许如经，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乖乖就范，每月缴付一笔保护费。

       社会动荡，治安每况愈下，人人自危，很多华人商铺都提早打烊以策安全，惶恐不安的甚至返回故乡，待局势稳定后再作打算。直到2003年，历时3年的内战才稍告平息。

       华人本以为生活从此恢复平静，不料，2006年爆发的骚乱，将唐人街毁于大火中，情况比之前更加严峻。罪案节节攀升，每天出入都得冒着被抢的危险，华人因此变得小心翼翼，以防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荡，华人有着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阴影肯定有，心情还未完全平复。”华人的活动范围缩小了。从前，他们会到河边网鱼、捉虾、游泳；如今，华人不再到河边捕鱼虾，也不再到椰园摘取椰子，以策安全。

       贫富悬殊或许是骚乱的肇因之一。土著每月赚取800至900块所币，这点微薄的薪水不足以养活一家，有的甚至连三餐温饱都有问题；华人则大多是老板，有房子、车子，吃好住好，生活富裕。

       无论语言、文化或饮食习惯，华人和土著都大不相同。对华人来说，土著思想单纯，活在当下，对未来没有规划，加上大部分没受过正规教育，生活仍然停留在原始阶段，饿了就吃香蕉、番薯、芋头，渴了就摘椰子解渴，要求的不多，非常容易满足。而在土著眼里，华人只懂赚钱，老是为将来忧虑，努力打拼就只为了生活及家庭。

       也基于此，早期华人对孩子和土著结婚深具戒心，他们觉得和土著在一起生活，准会挨饿，过苦日子。随着时代转变，加上当地华人女性不多，华人和土著通婚才有上升的趋势。

       早期，土著对华人敬重有加，尊称华人为“Master”（主人）。土生华人懂土语，了解土著的文化，对土著以礼相待，从不恶言相向。此外，他们也学会了英国人那套经商之道：稳扎稳打，只要有钱赚就好。“即使在店内逮到员工偷窃，也不要当面责备，最好把土著拉到一角了解情况，慢慢教导，不可以用粗口骂土著。”他们向来聘请土著打工，共事多年，与土著和谐相处。

       奈何，这一切却没能阻止2006骚乱的发生。“很失望，对前景的信心减低了不少。”生于斯的黎庆基，从小到大都有很多土著朋友。他和土著一起踢足球、打篮球，甚至组成乐队，感情非常要好。一直把土著当作朋友看待，店铺却无法幸免地被掠夺一空，复杂的心情难以言宣。

       太平洋赌场酒店业者梁兆强也是骚乱的受害者之一，酒店及赌场都被夷为平地，损失约4000万所币。在银行的资助下，赌场及酒店在原址建，但对于那场浩劫所带来的一切，梁兆强仍难以释怀，原本有意在当地建筑高楼及购置产业的想法也因此打住。为了防患未然，他聘请了70名士著当保安及打手，每天加以训练，以防骚乱再次来袭。“万一发生问题，我已知道如何应对，不必担心。”此外，他开始到国外分散投资。

       尽管与土著的关系不如以往，但在部分华人心目中，土著普遍上还是纯朴善良的，闹事的只是一小撮人而已。来自渔村的土著在骚乱发生的第一时间，冲到唐人街替华人解围并守卫店铺，便是一例。

治标不如治本，要拉近土著和华人的距离，首先必须从消除贫穷做起。台湾人曾在几年前到来指导当地人种植大米，向他们灌输自给自足的概念，以降低对进口货品的依赖。另外，有些公司也经常举办慈善活动，回馈社会不遗余力。

       华人和土著若能在彼此的相处中找到平衡点，相互包容、谅解，磨擦或许就会少一些。

所罗门群岛华人虽少，然而，他们对中文教育的执著、对传统节庆日的坚持，却叫人肃然起敬。

       1949年，当地唯一的华人社团——中华总会，利用战后的建材创办了中华学校，为的就是传承中文教育，让下一代学习中文。这所私立学校，只招收华人学生，以中文教学，另有一堂英语课。

       那时候，没课本，简陋的课室内只有一面黑板。教师主要是当地华人，学生则分为4班，上课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午4点。学生每天以毛笔习写生字，虽然资源有限，不过，在非华人为主的环境里办中文学校，成效还算不错。

       然而，学生流动率高，学校面临学生不足的窘境。于是，中华总会把学校转交给当地人管理，并且改为公立学校，开放让土著就读。学校目前有203名学生，华人学生只有20多人。

       中华学校始终是华人子弟的首选，因为它的学费比较低廉，每年只要5000块所币。当地另有两家国际学校，教师以白人为主，课程学费非常高昂，当地人每年要2万5000块所币，持外国护照者则要3万5000块所币。

       随着中华学校转型，也意味着中文教育的没落。中华总会于2004年在会所开办中文补习班，学生每月只需缴付250所币，以支付指导老师的薪水。目的就是为了传承中文教育，培养华人子弟学习中文的兴趣。

       补习班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4点上课，分为初级和高级班。学生有20多人、年龄介于6至12岁。全体学生一同上课，老师轮流指导。由于人数不多，老师有时还会按照学生的进度，个别督促。

       两个小时的补习班里，学生主要学习拼音和写字。有的学生因习惯了家庭用语，对话时总带有方言口音。难得的是，除了华人学生外，班上还有两名土著学生。他们对学习中文抱有很大的兴趣，学习态度认真，从不迟到缺课。

       当地中学教育制度不完善，水准不高，华人老早就为孩子的将来作好安排。完成小学课程后，他们就把孩子送到澳洲留学，首选是悉尼及布里斯本。为了让孩子安心上课，他们一般会在当地购置房子。

       华人保留得最完整的传统节日，非清明及重阳节莫属。华人非常重视这两个节日，固定每年到公墓祭拜先祖两次，以表敬意。中华总会事先向华人派发通告，然后由该会带领，一同到华人公墓扫墓、祭拜祖坟，费用由大家分摊。

       至今，中华总会已走过60个年头。作为华人唯一的组织，该会旨在替华人排难解忧，每当华人商家和顾客发生争执，它都会介入协调。唐人街被烧毁后，该会第一时间安排清理灾场，并协助灾民测量原址，以便重建，同时负责和银行商议减低税务。而政府也会通过中华总会向华人传达讯息，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唐人街遭火神吞噬，震惊全球，华人不单基业尽毁，更因此流离失所。其肇因是4月初的一场议会选举，当选总理被对手指责接受华商的资助贿赂选民，要求重新选举，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议会大厦抗议，最后却演变成针对华人的骚乱。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大批示威者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就一窝蜂冲向市区抢劫华人杂货店，得逞后就涌向近在咫尺的唐人街。华人听到风声，为保安全，早已紧闭店门，躲在店铺后方的住家内。滋事者情绪高昂，击破杂贷店的门窗，掠夺财物，大肆破坏后再纵火。

       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着唐人街，导致警方及消防队伍无法施予援手。华人惶然失措，只好冒着被滋事者伤害的危险，开着车子，突破人群，开往警察局、旅店及教堂避难。有的甚至纵身屋后的小河，游过对岸逃命。

       情况失控，大火在大风助势下蔓延，熊熊烈火迅速吞噬40家商铺，摧毁了华人大半辈子的心血。保险公司因骚乱因素不作出赔偿，华人血本无归，损失约1000万美金。

       骚乱持续了3天，部分华人逃到澳洲及纽西兰避难。中国政府于4月22日作出撤侨决定，将受困华人接回中国。随后，澳洲及纽西兰政府增派警察和维和部队，局势才有所好转。

       事发后不到两个星期，华人重新投入营业，之前撤离的也陆续回归。前途是祸是福，华人暂且不去理会，只希望能够尽快收复失地之后再作打算。

   撇开社会动荡等问题，这里的一切，无论生活或事业，都让华人难以割舍。骚乱的阴影还未散去，未来如何发展谁也无法猜透，华人只得走一步算一步，继续奋斗，以使美梦成真。

       家庭及事业都在这里，要舍弃，重新开始，谈何容易？即使离开了，相信华人仍会对所罗门群岛念念不忘，因为它储存了太多值得缅怀的美好时光，以及无法消除的痛苦记忆。

   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由15个岛屿组成。塞班岛、天宁岛（Tinian）和罗塔岛（Rota）是最大的3个岛屿，其中90%的人口集中居住在首府塞班岛。

       1521年，探险家麦哲伦环球航行时发现了该群岛，自此先后被西班牙、德国、日本和美国统治。二战期间，美日两军曾在该群岛发生多次激战，运载美国两颗原子弹的飞机，便是从天宁岛起飞。以致天宁岛成为终止二战的军事重地。

       二战结束之后，北马里亚纳群岛成了美国的托管地，后又被宣布为美国属地；原有居民和在当地出生的均是美国公民。

       岛上的二战遗迹被妥善保存至今。后来又修建了各种休闲娱乐设施，使它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无数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等地的游客。

       制衣业及旅游业，可说是北马里亚纳群岛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华人则是岛上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之一。

20世纪初，曾经有一名姓钟的广州人，到达了现属密克罗尼西亚的丘克（Chuuk），并与当地一名查莫洛女子结婚。这一个家庭曾经在大洋洲的几个小岛如帕劳、瑙鲁及塞班分别住过一段时日。其后人最后于塞班岛定居，完全融入了查莫洛人的生活，并且信奉天主教。他们曾经住过的地区，则被命名为“中国城”。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数名香港人将商业触角伸展到塞班岛，在这里设厂开店。他们不但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激发当地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吸引了更多华商前来投资。

       但是，在整个70年代当中，塞班岛仅有寥寥十数家华人，香港人约有十家，台湾人则只有几家。于1976年从越南来到塞班岛的谢判奇回忆说：“那时候，走在塞班岛的路上，一个小时也不见一辆车子经过。”可见当时的小岛多么偏僻荒凉。

       第一个来到塞班岛的香港人是严明睿。已经70多岁的他，在香港的时候原是一名教师，也曾经在关岛任职珠宝店经理，1971年4月来到塞班岛之后，小岛的风情和宜人的气候深深吸引了他，因而长期定居下来。

       严明睿在岛上开了第一间眼镜店，因此解决了岛民以前只能到医院配眼镜的不便。此外、他也是第一个聘请中国工人到塞班岛建筑民宅的老板。每逢中国传统节日，严氏夫妇就会穿上传统的服装，并且准备了满桌的中式菜肴，邀请岛上的华人到他们家里相聚。他们也时时教育孩子，千万不要忘本，一定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直到80年代，岛上制衣业蓬勃发展之后，华人的人口才随之增加。这时期，有许多中国浙江劳工被引进塞班岛的制衣厂，以女性为主，约占了95%,其中又以20多岁的女子居多，通常被称为厂妹。

       1998年至2003年，塞班岛制衣业达到了高峰期。与制衣业相关的大小工厂甚至多达四五十家，而岛上华人人口也一度飙升至两万多人。随着人口增加，许多中国商人也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里，美发店、超市、指压店、餐馆于是陆续出现。

       由于政策改变，近年来，有许多制衣厂都选择了撤离塞班岛，而厂妹也被分批送回中国。2008年初，华人还有六七千人，到了2008年末，则仅剩三四千人。人数的减少影响了生意额，大多数从事服务业的华商，面临经济萧条，只好结束营业，黯然离去。

 华人多数集中在首府塞班岛。较早迁居此地的华人，一般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另有部分华人以外来投资者身份定居。一部分则是合同劳工，手持每年需要更新一次的短期工作准证在当地讨生活。

       2008年初，当地六七千名华人中，约90%从事与制衣相关的行业，其余的则在加拉班（Garapan）商业区开饭店、卡拉OK、超市或指压店等。在天宁岛上的华人，则多数来自中国，在该岛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工作。

       岛上物价昂贵，一般劳工生活拮据，复因岛上缺少娱乐实施，也让她们深感寂寞，难以适从。因而基督教会适时的伸出援手，给她们带来各种帮助和心灵慰藉。教会和社团的努力，也为中文教育铺好道路，使华人子弟不至于与方块字脱节。令人惊喜的是，这小小的岛屿上有3家中文报，为华人平淡的生活增添几许色彩。

 一座原本荒凉的岛屿，因成了美国领土的零关税区，命运从此改变。

       短短十几年间，它吸引了来自美国、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30多家制衣企业前来设厂。这些纺织厂多数设在塞班岛的南部，产品上都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免征关税，不受配额限制。

       种种优惠条件让一些制衣业商家捞得盆满钵满。据塞班制衣协会统计的数字，塞班制衣业过去每年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费达6590万美元，占政府税收的三分之一。为了应付生产线的需求，厂家前后不同时期共招来几万名中国劳工。其中规模最大的制衣厂——联泰制衣厂，曾经自中国引进3000多名纺织女工。

       随着人口骤增，嗅到商机的华人也陆续前来。除了做游客的生意，华商还可以兼赚劳工市场，为他们提供日常所需。

       可惜好景不常。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纺织品出口配额增加，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成衣出口受到冲击。部分厂家因利润下降难以为继，开始撤离塞班岛。此外，岛上最低工资在面对舆论批评和竞争压力下也被迫提高，2008年初，最低钟点工资被调至每小时3.55美元，这对一些厂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至2008年底，岛上仅剩下两间制衣厂。

       工厂的撤离，接踵而来的便是厂妹陆续被送回国。华人人数下降，街道明显变得冷清很多，处处可见“空房出租”的广告牌子。零售业和餐饮业的生意也大不如前。

       华人开的超市在当地颇受欢迎。不过近年来因劳工和游客人数减少，超市销售额一路下滑。勤俭的华人意识到经济前景不明，消费时比以往更加谨慎，不再购买大件物品，将钱花在刀口上，只购买日常必需品、如大米、牛奶、汽油等。

       自2004年日航和韩航停飞塞班岛以来，该地游客人数持续下降，前景看似暗淡，却仍有业者认为，游客人数减少并不代表生意无以为继。塞班岛上仍有来此已二三十年的华人，在租来的土地上建了自己的房子或公司，置业意味着牵绊，似乎离不开了，唯有继续努力，保障未来。

       塞班岛华商往往同时涉足各个商业领域。例如经营酒店的，同时经营文具店；经营礼品店的，同时又经营射击场、旅馆、美容院、餐厅、面包店等。不过华人有苦自知，岛上水电供应不足、政府政策朝令夕改，都是他们头疼的问题。

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只有查莫洛人可以拥有土地。即使是混血后裔，也必须有三分之一查莫洛人血统才能置地。换句话说，最低限度，爷爷或奶奶必须是查莫洛人，才有资格买地，否则只能租用土地，最久租用期是55年。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绝大部分既无公民身份，也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没有归属感与安全感。

       华人家庭，一般自己在家里煮食，白米饭仍是主食，两菜一汤，简单朴实。礼品店的谢老板说：“30年前，华人在岛上只能吃到‘美国菜’如蕃茄、萝卜等。即使买得到青菜，也是从台湾或美国进口，一磅青菜美金两块多。”

       一直到十几年前，中国农夫来到岛上耕种。当地华人才有机会吃到新鲜又便宜的菜心、芥兰、小白菜等。华人爱吃菜，渐渐影响了嗜吃肉类和烧烤食物的查莫洛，他们后来也学会吃蔬菜和接受蒸煮的食物、

       塞班岛生活费非常高，一盘宫保鸡丁要价十美元左右。家里煮食费用也不低，猪肉排骨一磅75美分、大米50磅27美元。主要是因为这里绝大部分日用品和食物都得进口，商品种类也不齐全。

       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水源来自地下水或淡化水，而塞班岛的自来水明显带有咸味，不宜饮用。因此家家户户都得买桶装纯净水来喝，5加仑一大桶约2美元。

       身在当地的另一大群华人，是来自中国的制衣厂女工。她们的生活中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早期，厂妹们不被允许在外头租房子，必须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吃也在工厂食堂解决，甚少与外界接触；有的宿舍不过就是集装箱间隔成小房的铁皮屋。

       许多厂妹没出国打工前已在中国四处借贷，筹足偿还中介费，数达2800至5000美元之多。只是没预料到，美金也不易赚，工作第一年所赚的几乎都用来还债。她们一天工作10至12小时，有时还得通宵加班。一个小时赚一块多美金，有的还是以一件一件做好的成衣数量来计算工资。这情况维持了十年，直到近年才调整至每小时3.55美元的工资。

       赚钱不易，岛上物价又高，她们真得要省吃俭用，才能有所积蓄。一些特别节省的厂妹，一天只用一美元填饱肚子，一个月膳食费也就只需30多美元。

       一直到了后期，厂妹的生活才稍有改善。她们开始可以选择住宿舍或是和几位同事到外头合租房子。社交圈子似乎扩大了，有更大的自由在外走动，却不代表生活不再枯燥乏味。

       岛上缺少娱乐设施，工余之暇，可供排遣寂寞的消遣不多。除了到海边或郊野去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外，就只有到赌场去碰运气，或到舞厅跳舞，或租看连续剧光碟，或邀约三几好友搓麻将打发时间。歌厅、酒吧等娱乐中心，也是岛上居民排遣寂寞的好去处。有时闷得发慌时，就上歌厅解闷，周末晚上花3到5美元的饮料费，便可以在中国人开的歌厅，或是查莫洛人开的酒吧待上一晚。而中国人所经营的歌厅，无非就是几桌客人轮流唱两首歌曲。

每到星期天，塞班新生命中国基督教会的朱约翰牧师会开着巴士，到指定的地点载制衣厂工人到教会。这也是厂妹最宽心的时刻，她们一路上欢唱朝圣歌，有趣的是，厂妹唱出的圣歌，都别具中国韵味。

       星期天是基督教徒在教会里聚会的日子。他们唱圣歌、读经、听收师布道、会后还有联谊活动。来自新加坡的华人牧师彭国雄与韩国人牧师李满悦，在过去的16年里，曾在岛上的塞班华人基督教会为近2000名信徒洗礼。从1998年至2004年，是岛上制

       衣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华人人数最可观的时期。彭牧师说：“当时星期天早晚两堂的崇拜聚会，分别有三四百人参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也有上百人积极参加聚会，学习圣经。”

       教会的关切与协助，给厂妹带来温馨与慰藉，教会的活动，也给她们枯寂的生活增添了璀烂的色彩，久而久之，她们竟服膺于宗教的魅力，成为基督徒。

       华人教会也重视华人子弟的教育问题。

       大部分华人家庭都不让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一名华人家长解释道：“公立学校虽然免收学费，但是常出现课本不够、师资不足、书桌短缺的现象，甚至代课老师也可能不教课。”最令家长担心的是，公立学校的女学生，有一部分到了发育期就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上学。为了让孩子在良好的环境中学习，家长们宁愿缴付一个月280美元的学费，让孩子上私立学校。

       有些家长会趁暑假时，将孩子带回中国学习，多接触中华文化。有的甚至将孩子送回中国上小学，中文基础打稳了，再将孩子接到身边，接受美式教育。曾在中国上小学或暑假回中国学习的小孩认为，比起中国的学习环境和压力，在塞班岛接受美式教育简单轻松多了。

       塞班华人基督教会，也在岛上成立了一个正规的爱加倍基督学校，分12个年级。该校几乎免费教导几十名华人子弟，课程皆按学生本身的学习进度编排，使用中国中文教材。自2003年起，越来越多其他族群的成人小孩也来上中文课，人数多时甚至达60多名。

       岛上唯一的华人社团是美国塞班中华总会，也设立了中文补习班，并在2006年正式命名为“塞班中文教学中心”。该中心每月学费30美元，家境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助学金。

       除了办校教中文，中华总会也致力于协助发展地区经济，改善华人在当地的营商和工作条件，并不时举办讲座让会员了解如何申请签证、商业招牌以及聘请劳工等相关法令内容。每一项活动和付出，无不出于对当地华社实际的关怀。

       基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鸿沟，许多华人自我孤立，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鲜少跟当地人来往。即使是海峡两地的中台人士，也都各自为政，不相闻问。

* *小岛生活虽然难免有些苦闷，但也有热心人士本着兴趣，以及关怀华人社会的理想，办起了数份中文周报，其中包括宝阳出版公司的《塞班侨报》。另外，岛上也有一份华人办的英文报，即“塞班王”陈守仁的联泰国际集团所发行的《Saipan Tribune》。该报也是塞班岛第一家设有网络版的报章（网址：www.saipantribune.com）。*

 曾经有意在塞班岛建赌场的天宁皇朝，因为塞班岛天主教势力雄厚，居民群起抗议，转而将赌场建在唯一获发合法赌场许可证的天宁岛。因此，天宁岛有了“太平洋上的拉斯维加斯”称。

       天宁岛是北马里亚纳群岛的第二大岛屿。香港人所投资的天宁皇朝赌场大酒店，是岛上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天宁岛现有人口4000人，天宁皇朝酒店的职工占了大约25%。岛上有300名华人，长期定居的不到20人，其余的就是酒店的职工。他们主要来自中国福建、广东、陕西、山东、辽宁，以福建人居多。

       除了酒店业外，他们也从事农业、建筑和商业的工作。岛上有4家超市，其中两家是中国人开的，即黄顺公司和天红商店。另外两家则分别为日本人和韩国人所经营。

       早期来到天宁岛的郑洪祥说：“天宁岛地肥水好，适合种瓜类农作物，如西瓜、黄瓜、冬瓜、南瓜、葱和辣椒等。”塞班岛水比较咸，许多瓜果都无法生长，所以天宁岛的农作物也大量运到塞班岛和关岛。

       塞班岛的发展远胜天宁岛。曾经，两岛之间的联系，靠的是只能载4名乘客的小型飞机，单程一趟32美元；如今，大酒店自己投资，增设了两艘豪华渡轮，船费一趟只需15美元。

       政府虽曾考虑在两岛之间铺建桥梁，但两岛相隔着世界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加上人口数目未达下此重本投资的底线，建桥念头最终打消。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天宁岛的经济发展至今仍以外来投资为主。

塞班岛上的“中国城”之得名，源自一个混血华裔的家庭。

       钟路建医生（Dr. Jose Lujan Chong）是塞班岛上家喻户晓的首位华裔外科医生。他是北马里亚纳群岛政府公众健康部门首脑，同时也是至今唯一的华裔主管。他的父亲来自中国广东省，母亲是查莫洛人。

       他与卡罗莱纳人妻子以及5名孩子，在20世纪50年代举家搬到一个当时仍是一片树林的地区，并把该地称为“中国城”。他们搬走后，官方正式将此区命名为“中国城”。

       当地人称华人与查莫洛人的混血后裔为Chino，即Chinese和Chamorro(华人加上查莫洛人）的合称。身为第二代华裔混血儿，钟医生已经不会说华语，其后代更是如此。

       如今，“中国城”不过是当地一个住宅区名，地点靠近繁华的市中心。这是一个鲜少华人居住的住宅区，区区几家商店，没有中国风的建筑物，甚至在路上的华人也寥寥无几。中国城唯——家中餐厅潘氏美食，顾客多数是查莫洛人和菲律宾人。印尼华侨店主主要烹调中餐和印尼餐。中华总会会所大楼于2000年在“中国城”马苏街落成，才为这里增添了一些“中国气息”。

       反观位于塞班岛西部的加拉班，特别是海滨路，有较多华人聚集在那儿开业做生意。大大的中文招牌、红彤彤的灯笼高高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城。

没能在拼搏的岛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就好像养一只随时会飞走的小鸟。

       华人在岛上居住，没有计划离开，却又意识到努力耕耘的成果，自己不能全然拥有。投入得越多，不安的情绪只会与日俱增。

       只盼美国全面接管北马里亚纳群岛后，对华人移民的入籍条件和土地拥有权能够放宽，以便使华人有安全感，长远生活在岛上。

关岛位于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的群岛南端，常年阳光普照，属热带多雨气候，境内丛林密布，仍有许多处女地尚待开发。

       16世纪中叶，关岛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98年美、西之战后割让给美国。1941年为日本占领，战后1950年被宣布为美国领地。作为一个靠近菲律宾、台湾和日本的海岛，关岛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美军在岛上海空军基地的开支，是关岛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另外一项重要收入则来自旅游业。

 据史籍载述，首名到关岛的华人是Chaco。他在1648年因为一场海难而飘流到这里来。Chaco如今已是关岛Agat村一个大家族的姓氏。

       19世纪末，有少数中国人抵达关岛，并和土著查莫洛人通婚。他们的混血华裔，在多年同化的过程中，华人文化特征已然消失，但还是保留了华人的姓氏。那时期来到关岛的华人计有Won Pat、Unpingco、Limtiaco、Taitingco、Shaolin等，虽然他们的中文名字已无从稽考，但可以肯定Co是“哥”，Pat则是“伯”。混血华裔姓名的组成顺序：先是本身的名字，接着是母亲的中间名字，最后是父系的姓氏。

       二战之后，有一批人移民到关岛。华商Charlie Corn便是在1948年抵境的。他原本名叫Chan Corn，移民后将姓氏Chan改为Corn，以Charlie作为自己的名字。他是一位成功商贾，又是热心于公益的善心人士。美军工程师协会还特别将一年一度的高尔夫球赛命名为The Charlie Corn Golf Tournament，以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华人。

       之后又有零售业者James Lee、律师George Lee等人在60年代移居此岛。

       70年代，岛上出现新一波的移民潮，以台湾人居多，他们由3个类别所组成：第一类是台湾荣民工程处撤离关岛时，一群选择留下来的专业人士，他们包括工程师、建筑师、律师；第二类是一些到美国留学的台湾人，毕业后还不想立即返台，于是便到关岛暂住，结果一呆就是二三十年；第三类是因当时台湾政治动荡而决定以投资移民和家属的身份移居关岛的台湾人。

       在鼎盛时期，关岛的台湾人曾经多达5000名。他们在这空气宜人、生活安定的岛上受到了尊重，部分人便从此以关岛为家。然而，有一些老人虽然热爱这个小岛，却不得不随子女迁居美国。这时期，岛上也有1000名来自菲律宾的华人，他们多从事建筑材料的生意；另外，还有香港人约200名。

       1975年，越共统一越南之后，许多华人开始以难民身份来到关岛。由底层做起，在超市、餐厅、养鱼场、农场、修车厂以及富人家庭，有人甚至一天打三四份工。如今，他们有的已经当了老板，有的收租过活，过着自在的退休生活。而年轻的一代，则在金融、银行等领域身居高职，发挥专长，不但薪酬高，且生活安定。

       到了80年代，中国大陆移民开始抵达关岛。在80年代后期，有近1000名建筑工人随公司到关岛来开拓业务，他们几乎包揽全岛的建筑劳务市场。如今，岛上已有约4000名中国大陆人，数量超过人数2000左右的台湾移民。

* *已故关岛前议长安东尼 奥平科（Antonio R. Unpingco，1942-2007），1977年通过关岛议会投票，将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定为关岛法定的教师节。这名前议长有华族血统，他曾经到祖籍地泉州晋江的翁氏祠堂参加谒祖仪式。他的逝世，为关岛的一大损失。*

 关岛7000名华人中，近半数已入籍美国，部分拥有永久居留权，其中约三分之一属于混血华商、岛上华人人口每十年增长7%，他们大多聚居在塔穆宁（Tamuning）及得得多（Dededo）两地。

       他们有的在大公司任职、有的是专业人士、有的做生意，在政府部门供职的也不乏其人。在关岛总督的顾问团成员中，华商占了三分之一，立法议会里也有混血华裔议员，甚至有的担任议长。华人的出现，不仅没有冲击当地就业市场的结构，反倒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华人向当地人购买土地置业，也是按照市价，不欺骗、不使诈，赢来他人的尊崇。

       当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推广，归功于70年代以后的移民。他们出钱出力地创办中华学校、出版中文刊物，并成立社团以维持彼此的联系。在信仰自由的国土上，华人既可选择到华人基督教会，也可选择到佛光山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

       纵然有不少人视关岛为再移民美国的跳板，可终究有一群人已经将之视为永久的家园。

关岛北部得得多，人口密集，是多数华人聚集地，他们有的经营超级市场，有的设立诊疗所，悬壶济世。来到西岸的塔穆宁及杜梦湾（Tumon Bay），则不难见到新、旧移民经营的旅馆、餐厅、酒吧及超级市场等，而大多数的指压店，则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新移民所开设。

       华人专注发展自己的事业，店面开了一家又一家，无论超市、免税店、文具店、批发零售店或中、西式餐厅等都是如此。经营零售业的华商说：“索性连批发执照一并申请。进了大量的货，除了自己售卖之外，还能批发给其他商店或餐馆。”点滴积累的经验，华商摸索出在当地营生之道。

       尽管很多华商一直在叫嚷着经济大不如前，但也有人对关岛的经济前景十分看好。为数80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加上眷属总计1万7000人左右，将于2012年从日本冲绳搬到关岛来，牵动到102亿多美元的开销。搬迁前夕，许多基础设施的工程需动用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光是人力估计就需要1万5000人。当地华人猜测，建筑工人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

       人口的增多、设施的改善，这对从商者而言绝对是个好消息。大至建筑工程，小至餐饮零售，将无不受惠。

       前人创业，后辈扩展，关岛华人生意越做越大。年轻一代的接班人，青出于蓝，将父亲的生意多样化。譬如，拥有多家免税店的黄进佳，他的儿子开设了方克力厂，并计划将之打造成岛上的另一个观光景点。至于岛上其他继承父业的后辈们，也都干得有声有色。

       关路一家早期的中餐厅特美美华中国饭店，原为一名马来西亚华人所经营。它让当地人初尝烧鸭的美味，大受欢迎。后来被香港人买下，再经后代发展为现今著名的西餐厅Shirley Coffee Shop。2008年，它在关岛拥有5家分店，在塞班岛也有两家连锁店。

       那些在美国本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关岛来一展所长的年轻华人，纵使不做生意，往往也能谋得律师、教师、医师、工程师、会计师等不错的职业。

 关岛本身没什么农林渔牧产品，当地除了供应少数青菜、鱼虾之外，其他物资大多由外国进口。一名中医师回忆：“70年代的关岛只有美式超市，能买到的就只有马铃薯、红萝卜等，主妇们得自己想办法加以变通，善用巧思以烹煮同样的食材。”到了80年代，日本、韩国及台湾超市陆续进军关岛市场，华人家庭的饭桌上才出现东方蔬果，菜色也较以往更丰富、多样。

       许多初到关岛的华人，习惯以原居地的台币或港币来对比美金，藉以换算每日开销，结果常常舍不得花费。欧女士回忆十几年前，老是以鸡肉、青菜来煲汤配饭的日子：“那时，鸡肉吃腻了还是照样吃，因为它最便宜嘛，一磅才60美分。”后来，华人开始在岛上种植蔬菜，菜式逐渐多样化，价格也渐渐大众化。“90年代，一磅菜心或西洋菜售价5.50美元，现在只要两美元多就买到了。”

       尽管现在比以前容易买到各类食材，蔬果价格也比以往大众化，并且大家都认同自行煮食比较健康，可如今在家自行烹调的家庭已越来越少。今天的关岛华人普遍出门解决三餐，除了方便，也因为中餐馆越开越多，竞争激烈，消费者从中受惠，比如以前在餐馆点一碟炒菜要价十美元，如今只需6美元。

       华人的居住环境及条件一般都相当不错，连家电也十分美式。厨房里已经找不到煤气炉，用的都是平底锅及电炉，炒菜铁锅只有在餐馆才能见到。洗衣机、烘衣机的使用也已十分普遍，岛上几乎看不到洗好的衣服挂在户外晒，人们都直接用烘衣机将衣服烘干。另外，鉴于岛上的水含有大量石灰成分，所以家家户户都伙用桶装的纯净水，一大桶售价5美元。

       关岛华人多数已经在当地买房子或购地建楼。因为房地是永久地契，加上经济能力许可，他们都很舍得花钱装饰自己的房子。

       关岛每隔5至10年必有严重的台风来袭。因此，无论房子还是商店，家家户户都会在窗口及门外安装台风板。台风、地震的周期性降临，政府规定建筑物不得高过3层，否则都须经过特别的申请批准。

       台风肆虐之后狼藉一片，善后工作非常累人。然而，经过几次磨练，华人移民虽已不敢小觑台风的威力，却学会了笑看这个难缠的访客。

   在这科技发达的年代，人们可随时上网浏览资讯，但关岛华人还是习惯通过阅读报章来获取新闻及信息。他们办有中文月报《华音时报》，并深获当地商业机构的支持，其中80%的版位都留给商家刊登中、英双语广告。关岛总督和国会议员，也都各有一页专属的英文全版新闻。

       早期的中文学习班，还是热心的吴家漆腾出自己的物业ABC Building二楼充作课室才得以开办。当初只是单纯的为了方便自己的孩子学习中文，进而惠及其他华人子弟。当时象征式的收费只能发给老师作为补贴，水电费还是吴家漆自己承担。之后在华社的齐心协力赞助下，才慢慢发展成有组织、有美丽校舍的中华学校，学生人数曾一度高达190人。

       随着学习中文已经成为全球热潮，除了中华学校之外，还有好些资深华文教师在关岛开班授课，教授的多数是简体字。发展至今，不论是中华学校还是中文补习班，上课的不只是华人子弟，还有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查莫洛人等。前来上课的不只是小孩，还包括了已经在社会工作多年的成年人。

       中华学校除了教授中文外，还让学生接触中华文化和举办一些有趣的活动，如扯铃、象棋、跳棋、舞狮及民族舞蹈等。新春期间，该校舞狮队会到各商家处献瑞贺新年。而民族舞蹈班则参加关岛文化月的巡回表演，当地媒体屡次以头版报道其盛况。由于在推广中华文化上不遗余力，中华学校曾荣获台湾当局颁发的“教育部社会教育有功团体奖”。

       春节期间最热闹的活动，是大伙儿聚集在商场，为中华学校举办义卖会筹款。关岛人都喜欢华人的粽子、卤蛋等食物，有的人甚至在开卖前两小时就抵达会场，唯恐来迟了会扑空。

       清明时节，一些台湾移民会回乡扫墓，顺道探亲访友；台湾选举期间，在岛上生活多年的老华侨仍会返台去投票。返乡的华人，也经常从家乡带回来一些中文歌曲专辑或影片光碟。尽管在关岛也能收看到台湾的中天台，但电视频道的选择依然很有限。

  移居日久的华人，有的以个人或公司的名义，有的则透过社团伸出援手，尽心尽力地帮助新移民适应新环境，改善生活素质。中华总会、中国侨胞联合会及华商总会，是关岛3个影响力较大的华人社团。此外，还有关岛海外华人联合总会、越华联谊会及中华妇女会等。

       关岛中华总会成立于1972年，历史较为悠久，所以对华社的贡献也比较大，如引进“中天台”让关岛华人生活增添色彩，创办“中华学校”使华人子弟有机会接受中文教育，向政府征求土地并积极募款建立“中华公园”，为台湾921大地震筹募高达20万美元赈灾款项等。

       关岛中国侨胞联合会开始成立时，会员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不久后便开放给来自各地的华人参加。创会至今不过3年，已经有45个公司会员，34个个人会员。联合会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华人办理申请护照、延期护照、回乡证、认证和签证等。

       关岛华商总会于1993年成立，甚得华人商家的支持。之前该会名为“关岛华商协会”，自2005年林锦镛先生担任会长后，始改名为“关岛华商总会”，由一个非营利机构发展成有执照的“关岛企业”，并开始参与国际性的商业组织；会员开会时以英语发言，出版的年鉴内的图片也以英文解说。值得骄傲的是，关岛总督的顾问团之中，华商占了三分之一，十分受器重。

       关岛海外华人联合总会现任会长赖文章先生，是北马利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天宁岛以及罗塔岛的经济旅游大使。他也是关岛唯一的华人公证师，他还积极地促进关岛和中国两地多方面交流与合作，促成了当地与中国的广州、柳州等结为友好城市。

       关岛有两所华人教会，分别由来自台湾及新加坡的牧师组织。而岛上的佛光山则由来自台湾的法师住持。关岛的华人基督教会曾应政府的要求，到监狱去辅助劝慰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牧师说：“他们被关在里面，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1987年，台湾实施外汇管治，限制移民带资金出境。尽管外汇管制甚严，不过还是有人成功将资金外移，并到关岛投资做生意，尤其是经营家具店。价廉物美、款式繁多、售后服务又周到，加上当时的美军享有政府付给家具维修津贴，及免费将家具运回美国本土的福利，所以家具业非常兴旺。

       在岛上服役的美国士兵，初来报到时购买家具，返回美国本土前也购置家具。他们对红木家具情有独钟。一年半载之后，便在离开前把新旧家具全都运回美国。如此一来，家具业自然兴旺，同时也带动了运输业。经营运输业的林先生说：“那时期，我的船运公司的船只，运载的物品有80%都是家具。”在鼎盛时期，岛上有90%的家具店都是台湾人经营的，约有50家之多。

       到了2008年初，关岛的家具店已剩下不到十家，较大型的有成吉思汗家具店、陈氏家具与礼品中心等。家具店的生意大不如前的最大原因，是美国士兵们已不再需要从

关岛将家具运回家，因为在老家就能买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家具。

    已故华查混血儿Antonio B. Won Pat（1908-1987）是关岛第一位华裔立法议会议员，曾于1972年至1984年间，以议员身份为民服务，期间还担任过立法议会议长。此外，他也是首位代表关岛的美国国会议员。

       关岛国际机场（Antonio B. Won Pat International Airport）即由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女儿Judith T. Won Pat，则是现任的关岛立法会议员兼议长。

       Antonio 的父亲Won Pat，于19世纪末自广州飘洋过海来到关岛。他本为船上厨师，与岛上一名查莫洛女子结婚，并在阿加尼亚开了当地第一家中餐厅。这家中餐厅之所以闻名并广受欢迎，是因为Won Pat在餐厅里售卖冰淇淋，成为岛上第一个卖冰淇淋的商人。即便到了21世纪，老一辈关岛人每当提及此事，还会忍不住笑他总将ice-cream cone说成“akkinkong”。

       Antonio以教师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1936年当选为关岛议会议员。二战后，为了保障关岛人民的自由，以及关岛在美国的政治地位，他发起运动，主张关岛人应有美国公民权，从而改变了关岛的地位。

       此后，他与其他领导人推动自治运动，并在1969年促成美国众议院通过选举关岛总督的法令，使得第一任民选总督在1970年产生。早在1965年，关岛议会便通过了一项法令，即关岛在美国国会须有一名代表；由此，Antonio于1972年成为关岛在美国国会的第一任国会议员。

       在美国众议院，Antonio为关岛争取了无数发展计划，其中包括教育、保健、福利、民防、社会保障、农业、机场和公路的发展等。

       美国一位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J. Bennet Johnston）曾在一项国会记录中评价道：“Antonio是一位杰出的倡导者，也是一位谈判专家。在其12年国会议员生涯中，所达成的成就是一个典范。”

Antonio的遗照，至今仍悬挂在关岛立法院的走廊上。

 华人在关岛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家庭，同时为岛上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他们亲眼见证关岛的改变，并参与建设工作，也为此自豪。

       或许有人心里仍惦记着家乡，或许有人终究对美国念念不忘，可是爱上关岛的华人，珍惜在岛上的日子，享受新鲜的空气，过着受人尊崇的安定生活。

 地球上“最东又最西”的国家，指的就是由332个岛屿组成的斐济，因为这个美丽的群岛国度，处于南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地跨东、西半球，180度经线恰好贯穿其境。

       斐济人口不足百万，由斐济族和印度族各占其半，被称为“南太平洋上的小印度”；欧裔和华人则属于少数群体。

       斐济在187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到1970年才取回自主权。1987年至2006年期间发生的4次政变，暴露出这个新国家在政治上的矛盾与不成熟。

       2006年军人政府夺权之后，斐济失去了联合国的支持，连长期提供支援的澳洲和纽西兰，也联手抵制斐济军政府，使国家发展每况愈下。失业、贫穷、抢劫等社会问题，如鬼魅一般地围困着斐济，渴望离开的人越来越多。

       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过客的华人，离开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人们到斐济，几乎都是冲着它那天赐的财富而来的。

       在17世纪初，斐济各岛的丰富资源引起了澳、美以及欧洲商人的注意。他们以廉价的枪支弹药与土著换取高价的海参和檀香木，而在这段时期到来的华人也只是那些于商船上工作的华工，他们都随着船只来去匆匆，并没有真正在这里生活。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华人才逐步开始在斐济定居并建立商业王国。

       辛亥革命期间，大批来自四邑和中山的广东人逃到了斐济投靠亲友。他们在菜园和店铺工作，有了资本之后就开始创业，在苏瓦市中心开了一间又一间的店铺。在金明亍（“亍”为当地华人对“街”或其英文词street的翻译）、马亍、阿米亍及魏玛鲁道一带，华人所开设的杂货店、饼铺、洗衣店和小食店等比比皆是。当时，斐济三大公司之一的广泰公司，就是华人所开创的；而其他如中兴隆、永安泰、安和祥和广生等，也都是赫赫有名的华人大公司。

       早到的华人都已在市区闯出了一片天，后来的华人则多半为他们打工，想创业的就只能往郊外发展。他们在郊区用铁皮木板搭起小小的杂货行，卖一些吃的和用的，做的较多是土著的生意。由于那时的华人人数不多，加上亲友或同乡之谊，小杂货行与大商号之间，往往很轻易地就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大商号是总部，负责供应各类的货品，小杂货行则负责去采集各类土产如椰干等，然后运返总部以便出口海外。双方合作无间，有如现今的“连锁超市”，几乎垄断了当地的市场。

       一些山区村民身无分文，杂货行便提供以物易物的形式；土著爱吃面包，华人于是就烘培外脆内韧的面包分销各处，而且大受欢迎。健全完整的商业网络、灵活变通的生意头脑，再加上入乡随俗的策略，使华人在斐济的经济实力不断地扩张。

       但是从1930年便开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使华人的生意一落千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迷。

       二战结束之后，英殖民政府推行了一连串的新政策以积极发展斐济，但华人并不属于受益群体。1948年，政府成立了椰干管理会以及开办合作社，华商不但被禁止收购椰干，杂货行的土地也不再获准续租。生存空间因而越来越小，小杂货行终于纷纷倒闭，大商号也如遭断肢之痛，元气大伤。英国接着颁发的新移民法令，还禁止中国移民进入斐济，且规定当地华人必须领取身份证明（华人称之为“领牌”）。这一系列法令给华人带来了重重限制，几乎把斐济的华人社会彻底击溃。

       与此同时，斐济的印度社群则不断地扩展并壮大了起来。由于印度人入境不受限制，导致印度人的人口急速增长。华人将自己当作斐济的过客，印度人则把自己看成斐济的主人。他们在斐济安家置产，很快地便成了这里的一份子。

       直至70年代末，斐济放宽了对华人入境的种种限制。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中国男性，纷纷到斐济来投靠亲友，闯荡天下。80年代，许多东莞、中山人以及开平人也通过旅游签证来到斐济，并且留下来发展，因为只要拥有工作准证，就能得到居留权。

       从90年代开始，不少来自北方的中国人带着资金前来创业。1995年，另一批香港的移民以“投资移民”的身份登陆斐济。他们之中半数以上在多年之后都选择回流或移民到其他国家去。

       华人曾经掌握斐济四分之一的经济，虽然至今仍以经商为主，但他们已经失去昔日的辉煌。那些早期的华人公司也几乎销声匿迹了，后期创办的远东公司以及李氏企业等，虽然颇具规模，但是一旦和印裔族群的大企业一比，就有一段差距了。

* *斐济国徽上绘着一串香蕉，原住民也称香蕉作“Jaina”，与“中国”的英文发音相似，因为早期华人移民对斐济的香蕉种植业发展，曾经有过很重要的影响。*

 老移民及其后代的人数不超过20%，其余都是新移民。尽管有95%的华人已取得斐济国籍，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打算留下。

       斐济在华人眼中，是一块最合适不过的跳板。

       这里天气温和、民风淳朴、消费低廉，但币值却媲美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地沿用了英殖民政府的教育制度，孩子可顺利到澳洲、纽西当等英语系国家深造，这对华人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斐济的华人群体以广东人为主，其中东莞、开平、中山和台山四地的移民占大多数。21世纪以来，广东移民人数增长缓慢，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人数却直线上升。华人主要居住在首都苏瓦市及老托卡市（Lautoka），也有的居住在巴城（Ba Town）及其他小岛。

   斐济华人已经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要用铁枝、铁网将自己重重包围，才能安心。

       独立至今，斐济共经历了4次政变，2002年的那场算是转折的关键，斐济的经济自此就走下坡。2006年第4次政变发生后，斐济经济一落千丈，治安崩溃，罪案开始在城镇肆虐。

       在当地经商的华人、印度人及部分富有的斐济人，都成了劫匪的目标。首都苏瓦治安问题最严重，因此无论商业大厦、店铺或住家的门窗，大都加上了粗大的铁条或密实的铁网，看来像是一座野生动物园，造型各异的笼子随处可见。铁网的后方，透着主人不安的目光。华人小食店和杂货店被抢的几率很高，但店主除了防备也没有其他办法。人们苦笑道：“我们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大部分时间都得困在铁笼里。”

       他们的住家也被匪徒盯上，于是有些人养了七八只狗，就连打开家门也成了一个冗长的过程。“从大门进到家里，一共要开十多把锁，晚上也睡得不踏实，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惊醒。”华人叹息。治安问题已成了当地华人的梦魇，他们每每一见面便热烈地谈论彼此遇劫的经验和防盗心得。

       被抢劫过的其中一名华人摇头叹息并说：“其实，报警也没有用。”原来，斐济的警察没配枪，而抢匪却拥有大刀或铁枝，因此警察常常遭打伤。此外，执法不严也是匪徒横行的原因，再加上斐济监狱人满为患，劫匪被关押不久后往往就被释放；但即使被送进牢房他们也不怕，因为监狱既讲究人权又舒适，里头的环境可能比匪徒本身的住所来得好。种种原由，造成劫匪有恃无恐，横行街头。

       世风日下人人自危，只能自求多福。华人已经学乖了，只要听话交出财物，就可避免受到伤害。此外，人们也尽量避免天黑以后出门，苏瓦市中心在夜里就像死城一样，寂静得可怕。在苏瓦开礼品店的梁凌川慨叹：“几年前和家人吃完晚餐，还能牵着女儿在街上散步，现在我恨不得把车子停在餐馆门口，吃完马上跳上车离开。”

* *20世纪20年代，有一中山人方作标在斐济西区巴城开办了“方利行”，当地人以“方利”称呼他，巴城还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方利亍”。斐济华人在抗日战争中，共捐赠4架飞机给中国，其中一架由方作标独自捐，因此而得到蒋介石的褒奖，并获赠以中正剑。蒋还在他的墓碑上题写了「贞固流芳」4个字，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除了匪徒，一般斐济人也都认为华人是富裕的一群。

       斐济人相当贫穷，山区不少村民，还光着脚丫走在粗糙的黄泥路上，一顿饭只有几片撒了盐的芋头。华人每餐有菜有肉，一般又拥有商店、菜园等财产，这难道还不算富裕吗？但对华人来说，真正的富裕是华人大公司衰落以前的事了。在那之后，华人虽然还可算衣食无忧，但已不能用“富裕”来形容。

       从独立后到政变之前，斐济曾有过一段经济起飞的日子，华人也相对过得安逸。小食店的老板说：“80年代是斐济独立后比较兴旺的时期，那时一斐济元约能兑换0.90美元！”但如今，斐济的经济早已大不如前，失业率节节上升，百货涨价，人民叫苦连天。

       如此慌乱落后的国度，华人为何刚走一批，又来一批？

       原来大家都相信同一个梦，就是来斐济必能赚到钱，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并出国深造，然后可以再移民到更好的国家去安享晚年。圆梦的人不少，华人也就不再质疑这个可能性。

       作为艰苦创业的一群，斐济的华人一开始往往没资金、没学问，就凭着一股牛劲和决心。他们常常自嘲：“像我们这样的人，想当老板谈何容易？斐济就好在创业的门槛低，只要肯努力人人都有机会。”

       入籍斐济其实不难，居留期限是唯一的考量。华人选择入籍的原因一般都很实际，就是为了方便在当地经商挣钱、出国或移民。在劳托卡开礼品店的郑子刚，17岁抵达斐济，先在亲戚的杂货店打工，获得合法的居留权。他说：“原本要住满9年才能入籍，政变后改成5年，这对我来说是好事。”70年代之后来到斐济的华人，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

       斐济员工的薪资虽低，工作纪律却欠佳，老板多请一个，就得多花一份精神去监督。因此，华人生意一般属于家庭式经营，人手尽量不假外求，也因为这个原因，当地华人大企业并不多见。

       在苏瓦、华人的小食快餐店三五步就有一间，卖的是炸鱼、薯条和一些简单的中西快餐，既经济又实惠。开在市区或郊外的华人杂货店，所售卖的杂货非常齐全。而劳托卡市的华人商店则以礼品店为主，售卖廉价的中国礼品。此外，华人也经营理发店、美容院、面包店、肉店、中餐馆及网吧等。

       早期由华人所开创的黄金地带，至今仍是苏瓦市店租最贵的地段，但华人商店已经大大减少，很多都转手卖给印度人。华人坦诚自己的弱点：“印度人非常团结，整个家族可以合作将生意一代代传承下去。反之，华人个个嚷着分家，家散了，生意没了，大家各奔前程。”

       如今，斐济的财富主要操控在印度人的手里。他们在苏瓦、南迪（Nadi）和老托卡等地区经营的超市及连锁店，规模之大让华人望尘莫及。反观华人的店铺却总是老样子，昏暗拥挤而设备简陋。褪色的招牌，重重的铁闸，诉说着斐济华人社会的沧桑。

余中平（右）和印裔岳父一起创办的冷冻批发生意（YEE Cold Storage Seafood Ltd）,是少数规模庞大的华人企业。儿子（左）已答应当他的接班人，继承家族企业。

   走出苏瓦市区，郊外的山头上几乎全是东莞人开发的菜园。

       华人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袁炳裳指出，斐济市场上90%的农耕副产品，都由华人生产。他说，华人对斐济农业的贡献，是斐济华人史上重要的一笔，也得到国家的认同。袁炳裳在斐济种菜超过20年，如今已转行开杂货店。

       80年代，大批东莞农民来到斐济，带着一双惯于在田里干活的巧手。斐济常年阳光普照、雨水充沛，深黑色的泥土更让东莞人一眼就看出这是块宝地。他们向斐济人租了地，再整顿一番，就成了他们的菜园和家园。

       斐济的土地70%掌握在各部落的酋长手中，在华人看来，土著是“拿着金碗讨饭吃”，拥有好土地却不耕种。土著则觉得把地租给华人，既省事又能收租金，一举两得。如此“你情我愿”之下，华人向斐济人租地，往往一租就是30年。但斐济的土地法律不完善，经常发生有理说不清的事情。有时地主无理起价或预支租金，华人也只能硬着头皮照付。更甚的是，地主常把园里的瓜菜当作是自己家的财物，随手摘采，华人也无可奈何。

       30年过去了，华人菜园一直没有经历多大的变化。

       黄泥路依然崎岖不平，没有路灯照明。经济稍好的菜农一般会买辆四轮驱动车，才能载着他们翻山越岭，将瓜菜载送到批发市场去。一名菜农回忆：“以前没能力买车，每天凌晨一两点，就要挑着菜摸黑下山等公车到市场去卖，风雨不改，那种苦日子想来还心有余悸呢！”

       华人种菜的方式还很原始，从翻土、插秧、灌溉到收割，样样都靠人力。这里缺少水电供应，不少农民的日常用水，至今还靠收集雨水来解决。园里种满了斐济人的主食——木薯和芋头，另外还有生姜、小白菜和香菜等。有经验的菜农指出，斐济的菜园全靠雨水灌溉，虫害也少，只需喷洒一点农药。

       斐济算得上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一望无际的山头，人烟稀少，好几公里才有一户农家。从房子往外眺望，连绵一片的绿色尽入眼帘。把目光穿越过一座座的山头，就可以看到无边的蓝天大海相连。劳碌一天，喝杯热茶，放眼美景，是农民单调生活中最大的享受

       如果不是政局不稳，治安败坏，斐济还真是一个好地方。1978年到来的余先生说：“从前连晚上睡觉都不用锁门，现在可不同了。不久前家里来了抢匪，用大棍子把铁门撬开，击碎玻璃窗，还打我一顿，要我把钱交出来。”现在很多菜农已不敢住在菜园里，他们白天在园子工作，天黑前赶紧下山，回到市区的住处。

       近几年中国蓬勃发展，许多东莞人回乡，发现国内的生活比斐济更好。曾经有数十户东莞人，因受不了斐济的艰苦生活而把产业卖了，全家搬回中国。留下来的菜农则咬紧牙根，继续跟恶劣的环境搏斗。几乎每位华人菜农，都将孩子送到澳洲、纽西兰等国去深造，

       毕业后孩子们一般先在国外安顿好，再替父母申请移民，一家人在国外团圆——这就是东莞菜农家庭不断重复的老故事。

   斐济华人社会可划分出三大群体。1959年以前抵达的华人称作“老移民”，他们对斐济的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刻苦耐劳、守法且能充分融入的他们，备受社会的尊重。在他们眼中，70年代之后到达的华人，一概属于“新移民”。

       有趣的是，“新移民”本身又分裂出，中期移民”和“北方新移民”两大群体。中期移民以东莞人、中山人、开平人和恩平人为主，目前在经济上最为活跃，经营大部分的商店和菜园，生活踏实。但他们却渴望早日离开斐济，因此人数正逐渐减少。

       相反的，“北方新移民”人数增长得很快。从1990年开始，近千名的北方人陆续迁入斐济，他们财力雄厚，热衷于旅游业、地产业、制造业及建筑业等大型投资，经常在中国、斐济两国间来回奔忙。

       一些刚到不久的华人误入歧途，不择手段，因而成了害群之马。在华人形象最低落的时期，老移民设计了一个身分证大小的牌子，印上“FBC” 3个英文字母（Fiji Born Chinese的缩写，即斐济土生华人的意思），出门便将牌子挂在胸前。他们以此来跟新移民划清界限，标榜自已是奉公守法的老移民。“看到这些牌子真是令人好气又好笑。我们虽然不是土生华人，但20多年来也一直循规蹈矩，那我们是否也该挂个牌子呢？”一名中期移民一脸无奈地说。

       于是这些中期移民出钱出力办起中文报，力图重振华人的形象。2001年春节，斐济第一家中文报《斐济日报》终于面世。2005年，另一份中文报纸《斐济华声报》也诞生了。然而，中文媒体在当地的生存空间实在太小，年轻一代懂中文的读者也不多。因此，经济实力不强的华人，辛苦地撑着这一份苦差，经常入不敷出，如今两份报刊都已经从日报变成了周报。

       近几年中国与斐济交往甚密，中国政府除了资助斐济提升硬体设备，也关怀斐济华人的发展。斐济和平统一促进会、斐济中华商会等社团的成立，让斐济华人与中国接轨，增进双方交流的管道，开拓更多商机。促进会还举办了寻根夏令营，让土生华人子女可以回乡去寻根问祖。

       2005年，斐济华人联手筹办了“华人到斐济150周年”庆典活动。在新老移民不分彼此地共同筹备之下，活动终于落实，展示了华人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实力，也促进了新老移民的关系。

* *斐济华人于1930年创办的《飞枝国民月刊》，是南太平洋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刊物。这个刊物曾停刊两年，复刊时更名为《斐济华人月刊》，内容包括华社动态、海内外大事纪以及当地华人的作品，销量有150册左右，2005年停刊。*

 其实，华人难以团结的最大障碍是语言。老移民一般英语比广东话流利，下一代以对中文一窍不通的居多。中期移民主要以粤语沟通，而北方新移民则讲普通话和北方方言。同是炎黄子孙，他们竟没有共通的语言！

       但上一代难以跨越的鸿沟，下一代却只迈开一个脚步，就越过去了。

       当新老移民还在互相磨合之际，他们的孩子却已成为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在统一的教育制度下，土生华人的下一代，都拥有共同的语言及相近的思想，他们以流利的英语互相构通，结伴进行各种活动，也拥有一致的身份认同。

       “我们都是斐济华人。”年轻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在苏瓦，新老移民的下一代，大都在逸仙学校学习。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是斐济华人的骄傲。1936年，它在华社的热心捐助下建立起来，原名为““华侨学校”，主要为华人子女提供基本教育及学习英文的机会。1976年它改名为“逸仙学校”，并开放招收非华裔学生，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中文则作为外语。

       学校分为小学部和中学部，学生人数共1000多名。近20年来，中文课都采用了简、繁体双教材制度。小学部采用台湾教材，学习繁体字；中学则由中国外派教师执教，采用简体教材——这现象已成为逸仙学校的一大特色。“我们知道两套字体一起学，对孩子是有点困难，但多学总不会吃亏呀！”斐济华人教育协会的委员们经过多次讨论后，还是决定保留现状。

       委员们多年来致力于学校的发展，为下一代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而学生们优秀的表现，也让它成了人人争读的名校。它不只推广中文教育，也设立华人青年会，让学生通过艺术活动来学习中华文化。青年会舞蹈团的女生，从初中开始便练习各种中国传统舞蹈，男生则热衷于舞狮舞龙等表演。青年会常受到华人社团和斐济各单位的表演邀请，备受欢迎和肯定。

       很难想象这个发展迟缓的国度，竟是一个教育天堂。

       走过当地学校，会看到教师带领学生在操场上运动、游戏，孩子的笑容比斐济的阳光更灿烂。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女高中生说：“一开始语言上较难适应，但很快就克服了，与中国相比，在这里读书轻松得多。”孩子的转变，让许多新移民父母都觉得，来斐济的决定是正确的。一个母亲满足地说：“孩子比以前快乐，英文程度更是突飞猛进！”孩子在斐济受教育，除了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将来出路也广，因此成了许多华人选择暂时留驻的原因。

       华人的孩子自小聪慧而懂事，而他们眼中的斐济，显然也比父母看到的美好得多。一名16岁的女孩，诉说她对斐济的情感：“在这里，你见到人送上一个微笑，他们会回报你一个灿烂的笑容，这是斐济最美的地方。”在孩子眼中，没有种族之别，人们都一样友善。

       父母把斐济当跳板，孩子却把斐济当家。他们爱斐济爱得那么自然且深厚，因为自拥有记忆以来，他们的一切都跟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不过，他们却也了解：“我的家虽在斐济，但未来却不在这里。”这想法早已根深蒂固。父母亲从小就不断灌输他们，要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毕业后找份好工作，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他们牢记着父辈们的话：艰苦的路，只要一代人走过就足够了。

       选择留下来的年轻人，大多是老移民的后代，一般成为专业人士、白领阶层，或继续替父母打理生意。对他们来说，从小一起长大的斐济人是温和的。尽管当前局势不稳，但多年来他们已经适应了斐济的生活节奏，日子还是一样的过。一名华人说：“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因为治安问题而离开，全世界的治安都在恶化中嘛！”

       无论如何，留下的人始终不比离开的多。

       许多华人青年并不清楚自己是否喜欢国外的生活，也不确定能否在国外找到自己的理想。他们只知道，时间到了，自己就得离开。

       他们试着去相信这是一场宿命。

劳托卡历史悠久的中华学校，在一年前重新开办中文班。每天下课后，各年龄层的华人学生聚在一起上一个小时的中文课。

开创了第一家华人医药中心的刘赞文医生，是首位考获斐济政府医药奖学金、并进入当地医药大学深造的华人，他很感激政府的栽培。

 1855年，梅屏耀驾着小船，在当时的斐济首都列武卡（Levuka）落脚，开设第一家华人公司，取名“康利”，从事百货进口、批发以及零售生意，还有出口斐济的檀香木和海参。梅屏耀的身份背景始终是个谜，有人推断他是来自澳洲悉尼的华工。继梅氏之后来到斐济的华人还有杨祖波、骆槐、甄护、苏华及梁华等人，他们在岛上做小买卖，也从事香蕉及蔬菜种植。

       定居20年之后，梅屏耀才返回中国娶妻。随同丈夫回到斐济的阮氏也就成了第一个在斐济定居的华人女性。

       虽在斐济开枝散叶，梅屏耀最终却选择落叶归根，回到中国大陆去。妻子阮氏则决定在斐济终老，活至百岁并长眠于此。

       梅屏耀所创立的“康利”有过大约25年的辉煌日子，后代多数与当地人通婚。如今，“康利”和“阮”已经成为梅屏耀后人所沿用的姓氏，大部分媳妇跟婆婆姓“阮”，子孙则姓“康利”，这也成了梅屏耀的后代唯一留存的华人文化特征。

    第一位从政的华人叫方文清，他于19世纪末出任苏瓦镇议员。当斐济在1965年筹备组织独立政府时，华人推选出郑观陆、余汉宏等4名华社闻人组成了请愿团，会见当时英国殖民部部长怀特夫人，呈交请愿书，为斐济华人争取公民权及议会席位。这次举动，成了斐济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的重要起点。

       余汉宏于1966年成功当选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进入斐济国会为华人发声，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求取消华人领牌（身份证）的条例。在他不断努力的争取之下，这条例终遭废除。后来他也成功争取到华人大赦行动。如今余汉宏已退休，依然心系斐济的他和太太及子孙还住在斐济，不过其亲友多数都已移民。

       司徒波于1970年出任苏瓦市副市长。此外，谢焯、黄润江、刘孟光也先后出任了老托卡市长，何志美于1992年出任壬布卡政府财政部长。较近期的司徒新耀，则于2006年出任卡拉塞政府上议院议员，但因2006年12月那场军事政变而卸任。在那之后，华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略显力不从心。

       “斐济的种族意识很强烈，竞选席位和投票都是根据种族划分。华人人数太少，很难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一名华人沉重地说。

前国会议员余汉宏，曾经为斐济华人作出不少贡献。

   华人出发到斐济前，心底早已谱好离开的计划。从抵达的那一天起，就不断数着离开的日子。

       数十年来，斐济华人或许只是平凡而不起眼的小商人、小菜农，却绝对是最伟大的父母。他们长期劳作、吃苦，只为了给下一代最好的教育和未来。

       这个国家，记录了他们生儿育女、创业打拼的珍贵点滴，华人怎能对它毫无眷恋？然而，它无法许诺华人一个安定的未来。要说服华人打消离开的计划，太难！

       于是，一批批华人来了，又走了。

地处太平洋东南海域中的法属波利尼西亚（以下称大溪地），是许多世界探险家、作家、画家和明星神往的乐园。

       “我对大溪地人最仰慕的是，他们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愉悦。这里没有名人、没有明星，也没有穷人和富人的差别。”1960年代在当地拍片的美国影星马龙白兰度这么描绘大溪地。

       大溪地是法国的海外领地，由4组群岛组成，共有118个岛屿。因首府帕皮提和经济重心都在大溪地，所以“大溪地”成了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代称。其人口主要为原住民，其他的是欧洲人与当地人的混血后代等，华人则不到10%。

       这个得天独厚的热带岛屿，常年阳光普照、雨水充足，路边长绿油油的面包树，还有各种鲜艳夺目的热带花朵。1961年法国把它当作核试爆的海外基地，岛上的现代开发才多了起来。1996年，法国宣布停止核试爆之后，旅游业就成为大溪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大溪地有着“世界最浪漫的地方”、“最佳蜜月胜地”等美誉，游客长年络绎不绝。像这样一个充满魅力，令人无限憧憬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少了华人的身影。

当年，华人并非为了寻找人间天堂而来到大溪地的，之所以会发现大溪地，是源自于一次大胆航行的意外收获。

       在19世纪中叶，澳洲发现“新金山”，华人千里迢迢地赶来追寻黄金梦，可惜没多久金矿就枯竭了，梦醒的人们只好纷纷踏上归程，而另外一些人却冒险继续航向充满希望的南太平洋。就这样，约20名华工来到大溪地，岛上原始的迷人风光把他们留了下来。

       许多年之后，美国内战的爆发，使大溪地迎来了更多的华人。

       1861年，战争导致美国的许多港口关闭，货源极度短缺，制衣用的棉花价格也因此连翻了数十倍。这时，一个叫威廉史图华的爱尔兰人得到了大溪地女皇的批准，在大溪地购买土地以开辟棉田。他从香港、澳门以及广东沿海一带，招募1072名华工到大溪地的棉田工作。

       大部分华工负责开荒垦殖，并且挖掘鸟粪或磷矿，有一些则被分配去建筑仓库、住宅、码头、商店、棉花厂等。他们咬紧牙根艰辛劳作，同时期待契约期满之时，能存够钱回乡与家人团聚。当时，华工们都非常团结，不但成立了致公堂、信义堂等代表华人的社团，还建立了关帝庙以及华人坟场。

       好景不长，美国内战结束之后，棉花供应也随着恢复正常，价格大幅度下跌。1874年，棉田面对破产的命运，而负债的田主又逃得无影无踪，被遗弃的华工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顿感彷徨，如何在当地继续生存下来，一时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

       后来，滞留当地的华工终于获得了居留权，从契约华工的身份变成了定居大溪地的“华侨”。身份自由之后，生活也就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们最初以种植蔬菜、水稻、香豆等为生，有了积蓄之后，就着手经营起杂货零售商店，或从事香草加工业等。

       来到大溪地的华工大多数是广东客家人，其中祖籍惠阳、东莞、宝安的占了约95%。一名在大溪地出生的客家人说：“1910年左右，在大溪地落脚的叔叔写信回家，告诉我们有关大溪地的情况。后来父亲也到了大溪地，在华人开的面包店打工。之后我和弟妹陆续出世，我们跟父母亲便一直定居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第一代华人，几乎都有着相同的故事。

       1926年，大溪地的华人人数已达到4000人左右。他们大多数是从华工转行为小商人，之后，也出现一些大规模的华人商号。这些商号在各岛之间收购香豆、椰干和珍珠这3种土产，再经由帕皮提商人转手卖到欧洲去。不过，这个行业经常受到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风险极高，因此这个领域的成功者并不多。大多数的华人还是经营家庭式的杂货店，踏实地过着小康生活。

       做生意虽然可说是华人的强项，但是，他们在这里终究是外地人，经商过程时常受到法国政府的种种限制。华人所经营的小型杂货店，每天的经营时间都很长。华人不但刻苦耐劳，生意手法也很灵活。他们允许顾客赊账，为贫困的当地人带来方便，因此赢得了他们的欢心。

       二战结束之后，法国政府协助大溪地的华人重返他们的祖国，约有700多名华人因而踏上了归航。这批华人有一些回到了家乡，有一些却辗转滞留在香港，结果还是犹如宿命般地回到了大溪地。1949年，中国政局发生了大变化，也让一些原本坚持要“落叶归根”的大溪地华人，重新思考以及规划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当归国之路变得曲折莫测的时候，华侨也就决定留了下来。于是，原本被他们看作驿站的大溪地，从此便成为了漂泊的终点。

       这些决定留下来的华人不但辛勤工作，而且主动融入当地社会。1960年，法国的移民政策开始有了改变，4年后，法国政府又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并且批准华人大量入籍当地，因此，拥有法国国籍者在1965年就增加到378人。同时，原本困扰着他们的经商以及购置产业的种种限制都废除了，社会地位也自此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在80年代，法国政府颁布了新移民政策之后，华人人口持续保持上升的趋势，直至近来政府重新控制移民，华人的人数就一直维持在2万人左右。

       这些变化，也促使大溪地的华侨社会转而成了华人社会。

两万名华人看起来并不多，但他们在经济领域上异常活跃，举足轻重。

       华人所经营的商店几乎遍布波利尼西亚，连人烟稀少的波拉波拉小岛（Bora Bora Island）上，唯一的杂货店也是华人开的。

       大溪地现有的华人多为早期移民的后代，其中客家人占大多数，还有少数广府人及后期抵达的香港和台湾移民。大部分华人居住在大溪地岛，尤其集中在首府帕皮提一带，而其他岛上也有少数混血的华裔。

       华人在大溪地拥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华人的成就全靠一代代人辛勤耕耘而来。如今，他们已主导着餐饮业、百货业、进出口贸易、汽车代理、工业生产、蔬菜种植业及珍珠贝养殖业。但与经济上斐然的成就相比，华人在政治、文化及教育的发展上，却略显逊色。

       大溪地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华人成员。大部分60岁以上的客家人和广府人，还能说流利的家乡话，但一般华人都以法语沟通，能读写华文的华人已非常少。而中餐，就成了联系华人与传统文化的最佳桥梁。

大溪地成为南太平洋最多华人居住的岛屿，有着其必然的原因。

       大溪地法阿（FAA'A）国际机场总在午夜时分开始忙碌起来。飞机才刚降落，欢乐的气氛便将人重重包围。漂亮的大溪地女孩，将香气四溢的栀子花送到每个到访者的手里，那些穿着花衬衫的乐手，则弹唱着旋律轻快的迎宾曲。人们疲惫的神经即刻松弛下来，嘴边绽放着微笑。

       这确实是个让人第一眼就爱上的地方。当晨曦洒落大地，帕皮提便开始散发它的热情与活力。

       作为首府，帕皮提是经济活动最为集中和蓬勃的地区，也是大部分华人聚居经商的地方。

       帕皮提的中心地带有很多店铺，大多挂着法文招牌，中文少得可怜，但其中约七成都是华人所经营，包括小食店、服装店、首饰店、中药店、礼品店、电器店、音乐店及布店等。这些商店风格低调、朴实而多样化，老板总有本事将原本可摆满3家店铺的货品，全都摆进一家店里去卖。早期华人多靠一家小店发迹，老店往往已有数十年历史，而近年来新开的店则不多。

       在市中心，华人开得最多的就是小食店，主要售卖中式炒饭炒面、简单的客家菜及粤菜，有些也兼卖法国餐。据说，帕皮提有80%的餐饮业都操控在华人手里。

       当年法国在大溪地建厂进行核试验时，引进许多员工，迅速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各种小食店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开业，而第一家中餐店也在1962年出现。投资餐饮业及酒店业的黄镕基，当时也开办了自己第一家小食店，一举成功，生意越做越大。

       如今，帕皮提到处都有华人经营的小食店，规模较大的餐馆有十间左右。金马海鲜酒家的老板钟远光说：“大溪地市场很小，但还好土人的食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的销量很高！”

       大溪地土著食量有多大，举个简单例子就能说明：华人通常要两人共吃一条的法国面包，土著却要一人吃一条才能饱。在餐馆里，法国人一般慢条斯里地吃，也吃不多；而土著不只吃得多，还吃得快，他们通常以狼吞虎咽的姿态，半小时内就吃完五六道菜，结了帐捧着肚子满足地离开。因此，土著顾客深受华人店主欢迎。中餐进军大溪地数十年后，土著已完全接受了中餐，原本爱吃法国面包与炸鱼排，现在却更爱吃米饭和中甜酸鱼片。

       杂货店和超市的华人老板，也特别注重食品的采购。经营超市的廖桂生，还卖起自制的雪糕。他说：“大溪地的4家雪糕品牌，华人就占了其中两家。土著很爱吃甜品，我的雪糕每星期都能卖出100多盒！”此外。华人超市也采购了大批中国传统风味零食如话悔、酸梅等，深获土著欢迎，销量不错。

* *大溪地人喜欢华人的传统食品和服装，也爱过春节。有些学校，在春节前让小孩穿着传统服装上课，并吃中餐庆祝。过年时，一些大溪地人还会穿上华人的旗袍、唐装等，一身红彤彤的装扮，连华人都自叹不如！*

大溪地华人生于斯，长于斯，十分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因此商机都抓得很准。

       土著信赖草药，华人马上将中药和中医引进大溪地。春和堂老板娘、也是中医师的谢红说：“很多土著病了都会来找我，想进补时，还会来挑选人参！”虽然目前当地中药店不比法国人开的西药店普遍，但随着土著越来越信赖中药，连华人超市内也可买到从中国进口的中成药。

       大溪地的服装店很多，竞争激烈。土生土长的提奴（Tino）是当地少数能讲流利华语的华人，他和太太一起开设的服装店就在帕皮提市中心。他们突围而出的方法很简单：“土人体格壮硕，买衣最头痛的是找不到尺码，我的店叫MAXI，尺码超大，他们总能找到合身的！”

       此外，华人商家的成功秘诀总离不开“勤奋”二字。

       大溪地人至今仍保留着午休的习惯，许多非华人商店，在午休时间会暂停营业一小时，华人却继续营业。午餐后，许多人爱利用剩余时间到处逛逛，买点小东西，这都成了华人眼里的商机。华人商店在星期六也会营业半天，甚至开到下午3点，以便多挣半天的钱。这几年大溪地经济发展缓慢，许多店家开始向华人学习，延长营业时间，希望能增加生意量。大溪地的市场小，成本高，生意不容易做，员工最低薪金约1500欧元，因此一般华人家里都不花钱请佣人。小岛上资源有限，吃的、穿的和用的几乎全靠进口，成本非常高，华人要不是精打细算，连生存都会成问题。

       近几年不少中国大陆企业来大溪地考察，面对惊人的高消费，很多人摇着头匆忙离开。一瓶小瓶装矿泉水要一欧元，一盘炒饭最便宜也要十欧元，而租一间两房公寓则一个月得花上2000欧元，令人咋舌！

       那当地华人在大溪地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气定神闲地说：“只要一切习惯了，就能适应。”的确，那些经济能力远不如华人的土著，还不是每天开开心心地过生活？

       华人也是出了名的勤俭，总抱着居安思危的态度过日子，大溪地土著则奉行享乐主义，活在当下。华人看见土著花钱的方式都不敢恭维，但也不禁自嘲：“如果土著学会了华人的勤俭，那我们的生意便做不下去了。”

       华人祖辈们在大溪地辛勤奋斗，为下一代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许多华人表面上经营一家小店，却继承了家族的地皮和产业，很多市中心的大楼业主都是华人。他们不少人衣着朴素，却开着名贵汽车，住依山面海的别墅，还可以全家到国外去度假。

       近几年来，资产丰裕的华人企业家也开始进行跨领域发展，生意迅速扩展到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建筑建材业、石油业及汽车代理等，有的还投资兴建宾馆和旅游中心。

       然而老一辈大溪地华人那种奔波劳碌的生活，已无法获得下一代的认同。年轻华人从小受法国教育，有许多土著朋友，人生观已经不一样。他们比父辈更懂得享受当下，活得更豁达，不再肩负养家的重担。他们一般都受过大专教育，有些还留学法国、澳洲、美国等，学成后却多半都选择回到大溪地生活。由于大溪地公务员或白领阶层的薪金优渥、假期多且福利又好，因此他们大多不愿继承祖业或创业，而甘于当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 *大溪地盛产黑珍珠，不少华人从事珍珠养殖业。曾被《世界地理》杂志誉为“大溪地珍珠之王”的温惠仁（Robert Wan），不但拥有最大的黑珍珠养殖场，也是大溪地最大的珠宝出口商，还在首府开了一间珍珠博物馆。*

 大溪地最令人称羡的地方，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朴素。

       一名留学台湾和法国的混血华裔说：“我离开5年，回来发现岛上发展不少，但人们的生活还是和5年前一模一样，所进行的活动和谈天的话题大同小异，这令我很意外！”

       作为靠旅游业挣钱的小岛，星期天全岛人民却照例休假，连华人也不例外。这一天游客想找家小店吃饭都成问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若是换作其他地方的华人，也许就会把握良机照常营业，但大溪地华人为什么白白放弃这大好机会呢？

       原来，在这里的星期天，即使用双倍的工钱也请不动工人来上班，他们或忙着上教堂，或到海边游泳垂钓，无论进行什么活动，其最重要的原则是——假日绝不工作。华人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因此也将假日留给自己、家人和朋友。

       在大溪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非常亲密。这里地方小，华人圈子更小，华人在路上碰面时，即使彼此不认识，也会热情地相互打招呼。

       生活在如此人性化又健康的环境里，老人一般长寿，因此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比比皆是。这对重视家庭的华人而言，不愧是一个天堂之岛。此外，大溪地人的热情也感染了华人。这里是法国和大溪地文化的混合体，岛上人们碰面时喜欢以法语“Bonjour”互相问候，道别时则用大溪地语说声：“Nana”，别有特色。华人对这两种文化都适应得很好。“我们见面时碰脸颊的动作是受法国人影响，开心时仰天大笑，则极像土著。”一名华人如是说。

       这里四季如夏，一身古铜肤色的华人有时真会让人难以分辨其身份；而混血华裔那棕蜜色的皮肤、漂亮的轮廓更是羡煞旁人。这里男女老少都爱穿印上花朵图案的衣服，女士们还会在发梢别上鲜花，一身轻便的打扮犹如正在度假。

       一名从香港返回大溪地定居的女士说：“在香港哪有人穿短裤拖鞋招摇过市的？这里的打扮很随性，很自在！”

       法语是全岛人民的沟通语言。从商店招牌、餐馆菜单到书店售卖的书籍都以法文为主。由于中文在当地缺乏使用价值，因此不受社会重视。其实，大溪地在1920年代曾有4间中文学校，主要以客家话或广东话授课，学生总数超过1000人。其他有华人居住的岛屿，也都曾设私塾让子女学习中文，有些人还把孩子送到香港或台湾去深造。

       但1965年以后因政治因素，这些学校逐步被关闭，中文教育就再也没有恢复。目前虽有中华会馆和国民党支部长期开办中文补习班，主要教导客家话和华语会话，可惜师资和生源都十分短缺。

       现在，虽然不少华人还保留中文名字，但实际上从小到大都是用法文名字。第二、三代的华人父母多不谙中文，当老一辈过世，下一代也就此失去了中文名字。

* *虽然这里华人从政的不多，但表现不俗。在国会和经济、金融等部门，都能看到一些华人面孔。例如，前任大溪地总理加斯东唐桑（Gaston Tong San）就是华裔。*
* *自1968年开始举办的年度“飞龙小姐”（Miss Dragon）选美会，除了规定参赛者必须是华人或华裔外，他们也要有中文名字。那些没有的，只好借用母亲的名字来报名参赛。成功加冕者，将代表大溪地参加世界华裔小姐选美会。*

华裔Charles Fong Loi是帕皮提的副市长，他说华人公务员表现非常好，特别在理财策划上，常获重用。

中华会馆与信义堂的创办人之一李文彬（左下角相框中人）的第二代后人李琼贤（左）及第三代李文生（右）仍居住在大溪地。李文生说：“我的根在大溪地，我觉得中国离我非常遥远。”

共同的教育背景加上频繁的通婚，使华人迅速融入大溪地社会。此外，宗教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溪地人民多为基督徒，而华人当中的基督徒人数比佛教徒多。华人教会在每个星期天，都进行法语、客家话双语并用的周日崇拜，出席的多数是中年以上的华人，年轻人则不太热衷。不过，不少华人天主教徒还保留了清明祭祖的习惯，也会到庙里烧香求签。

       在当地，小而精致的教堂随处可见，但华人庙宇却只有一间坐落在帕皮提的关帝庙。1987年5月30日，信义团呼吁华人社团出钱出力，重建了富丽堂皇的关帝庙。每逢初一、十五华人都来庙里烧香，春节期间，来上“头柱香”或求“新年签”的人更是特别多。平日等待解签的人群中，除华人外，还包括土著、欧裔和游客。

       每逢星期六，华人开办的气功班也在庙旁的空地上课。可以说，在大溪地，关帝庙就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此外，华人在大溪地的墓园则坐落在一片山坡上，环境非常优美，还有独特的设计——每一个墓碑都面向大海，仿佛在遥望先辈的故乡。“有人看过我们的华人墓地，都笑说风水很好，难怪后代在这里生活无忧。”一名华人笑着说。

大溪地关帝庙为南太平洋最大的关帝庙，是此地重要的中华文化象征。

大溪地墓碑设计独特，每座都加上了顶盖。墓碑上或刻有中文字，或只写法文。每座墓碑都朝向无边的大海。

沈秀纯是大溪地华人心目中永远的英雄。虽然逝世已超过百年，他的感人事迹却仍然在这里流传着。

       19世纪中叶，新旧侨胞经常聚在公众俱乐部下棋赌博。有一次，他们之间发生激烈的口角，导致一名同胞被活活打死。因为没有人愿意供出凶手的身份，警方就只好把所有的人都拘留起来，限期自首，否则被拘留的所有人都将被判刑，并且驱逐出境。

       身为信义堂的成员，沈秀纯于是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向警方“承认”自己就是那位凶手。1869年5月19日，在众人的面前，他成了当地首个被砍头处死的人。

       为了保全其他同胞，沈秀纯牺牲了自己，因此深受华人爱戴和崇敬。他们为他建了一座大墓，且在关帝庙里设下神位。在他的墓碑前，常年都有华人前来献花。

帕皮提市场，是一扇展现华人生活风貌的窗户。

       每天清早，市场上就已人头攒动。这座双层建筑的底层是菜市场，售卖各种肉类、海鲜、蔬果及鲜花等，楼上则售卖纪念品和首饰。前来做生意或购物的华人，主要集中在市场底层。

       在市场一角，有两三个华人的猪肉摊。一名女肉贩，在摊位上贴着家里养猪场的照片。她指着照片说：“我们家共养了1500头猪呢！”星期天早上，华人还开档卖起叉烧、烧肉，据说那已是几十年的老字号了。市场其他角落，华人也摆卖海鲜及蔬菜。华人的菜摊选择多样化，除当地人常吃的芋头、紫香蕉之外，还有华人常吃的小白菜、芹菜及香菜等。有些摊位还有华人最爱的豆腐、客家人腌制的咸菜及广东人的咸鱼。连大溪地人都爱上了这些华人传统的风味小吃！

       美味的中式点心在这里极受欢迎。每天午休时刻，市场左侧一整排熟食档口都挤满了客人。熟食档主要售卖华人传统糕点和点心，如烧卖、炸云吞、春卷及烧包等。点心的水准一般，份量却很大。熟食档也卖起了中式便当，有白斩鸡饭、中式炒饭和客家焖猪肉等多种选择，比西式快餐更受欢迎。

       看到大溪地人排排坐着吃中式便当，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早已将中华饮食文化融入了人生活之中。

老板娘说：“大溪地人很爱吃烧卖，他们都是一打一打的买！”在这里，华人把烧卖叫成“卒仔”，当地人则称“Bounchor”(香槟木塞)。

也许世上并没有真正的桃花源，但对许多华人来说，大溪地已经接近完美的乐土。

       大溪地华人大多家庭和事业美满，生活安逸；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华人从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精明或幸运。能在人间天堂享有快乐无忧的今日，只因为他们总比别人更在乎未来，更周详地去计划明天。

南太平洋的浩瀚海域，散布着成千上万的海岛。自16世纪开始，西方列强便依仗着船坚炮利，征服土著，将海岛沦为殖民地。为了掠夺资源，当政者以变相的奴隶贩卖形式，从中国华南、港澳等地招募了大量的契约华工，强行驱赶他们到种植园与矿地去服劳役。华工一旦恢复自由身，便弃农从商，成家立业，在此地继续展开他们的生命旅程。二战后数十年来，尤其是70年代以后，新移民相继移入，不但使华人人口递增，也改变了华社结构，扩大了华人的经济活动圈子。

这里所谓的“大洋洲其他国家与地区”，是指专文未论述的大洋洲诸国与地区。

      浩淼的南太平洋海域，横亘着成千上万的岛屿，犹如璀璨的明珠，点缀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这些岛屿基本上由三大群岛形成，即：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以及波利尼西亚。

      众多岛屿大小不一，人口分布不均。除了澳洲与纽西兰较为人所熟悉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都是甚少被人提起的小岛，如帕劳（Palau），面积只有458平方公里，人口约2万人，由200多个火山型岛屿和珊瑚岛组成，其中只有9个岛有常住居民。

      在西方势力仍未伸向大平洋岛屿之前，这一带居住着美拉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及波里尼西亚人等土著，他们仍然处于石器时代，主要依赖狩猎与采集来生活，辅以原始的农耕技术生产。

      从16世纪开始，西方航海家便在南美洲与非律宾的漫长航途中，初步“发现”了澳洲、新几内亚及太平洋诸岛。在接下来的两三百年里，这些野心勃勃的西方航海家，争相跨海来探险，陆陆续续“发现”更多岛屿。到了18、19世纪，列强更通过武力侵略扩大地盘，瓜分豆剖，建立各自的势力。

      列强中最早捷足先登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接踵而来的是荷兰人的探险船队，英、法、德及美国，也不甘落后，纷纷组织船队来探险，都各有所获，列强间为了争夺殖民地，不惜兵戎相见，大动干戈。争持不下，便诉诸谈判，商议瓜分，利益均沾。英国是最大的赢家，取得最多岛屿，将它们沦为保护地或殖民地。

      经过了殖民政府多年的统治后，这地区的大多数原住民都极力争取独立，除了萨摩亚独立国（Samoa，亦称西萨摩亚）及瑙鲁（Nauru）分别于1962与1968年取得独立外，其他的岛屿如汤加（Tonga）等，都先后于70年代建国。不过还有一些群岛依然保留列强海外领地的地位。

在契约华工受招募而来之前，最早的华人移民是受雇于欧美及澳洲商船上的华人，他们或当厨师，或当工匠。远在19世纪初年，这些商船就在斐济海域附近寻找檀香木及海参，运销中国市场。檀香木贸易也把首批华人带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及新赫布莉里底（New Hebrides，今瓦努阿图Vanuatu）。接踵而来的是一些华人自由移民。

      据资料显示，在1903年大批契约华工到来萨摩亚独立国之前，那里已有12名华人，其中6个经商。他们是：

      阿穆（Ah Mu），1875年左右来此安家落户，从事运送货物与修补车轮等小生意，后来终于发迹。他死于1910年，由儿子约翰·阿穆继承父业。

      阿苏（Ah Sue）年轻时曾在船上当厨师。嗣后在萨摩亚独立国的乌波卢岛（Upolu）定居下来，经营餐馆及小商店。1912年逝世，享年75岁。儿子詹姆士·阿苏是出版商与编辑。

      方违昌（Fong Cheong），广州人，早期曾在英商船上当厨师，后定居于此，他与当地妇女成婚，1920年去世，享年57岁，葬于华人公墓。儿子方华源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国后与德国女子结婚，共育有7男2女。

      阿清（Ah Ching），1854年生于福建福州，先是当船员，后定居乌波卢岛，与当地酋长女儿成婚。先经营小本生意，批售鲑肉、蔗糖等食品，后来成为巨商。1923年逝世，终年69岁。

      阿松（Joseph Ah Soon），先当商船伙食管理员，1897年定居于此，经营小商店，代理中国食品及用品，因而发迹。1932年去世，享年58岁。

      其他华人包括阿昌、阿银、阿乔（Ah Kiau）、阿计（Ah Gee）、阿满（Ah Man）、阿肖（Ah Siu）等人，他们介于1883年至1899年间在此定居，从事的职业包括厨师、木工及面包师傅等，其中一人曾为美国驻萨摩亚领事当服务员。

      西方航海家越洋探险的主要目的是寻觅金银财宝，一旦美梦破灭，便向原住民诉诸武力，强行霸占土地，掠夺资源。他们锐意开荒拓土，栽种经济作物供应世界市场，以赚取庞大的外汇。同时，南太平洋某些岛屿盛产鸟粪与磷酸盐，适宜采掘外销。然而这些地区缺少劳动力，原住民无法胜任种植与采掘工作，他们只得设法招募契约华工与印度劳工前来补缺。就这样，契约华工便一批批应招而来，成了这地区的早期移民。

      从20世纪伊始，招募人员便在汕头及香港设立招募办公室，定下了合同，规定契约劳工的工作时间、伙食、住所、医药及薪金，合同以3年为期，期满后需遣送回国。劳工如满意（通常劳工并不了解合同的含义，即贸然签约），即与招募人员签约，同意登船。运送华工的船只，途经台湾海峡、菲律宾、雅浦（Yap）岛。在约20天的航程中，华工被困囚在“浮动地狱”中，受尽磨难。

      大多数华工被派往乌波卢（Upolu）的种植园劳动，一部分被分配到萨瓦伊岛（Savaii）。种植园每日工作长达十小时，种植橡胶、香蕉、可可及椰子等，日晒雨淋，劳累一整天，回到宿舍，没有娱乐调剂，许多华工便染上赌博与抽鸦片等恶习。尽管华工勤奋守法，表现出色，但却受到种植园主的不良待遇，甚至遭督工虐待与殴打。

      华工大多数年轻力壮，孤家寡人。不过他们工作勤奋，家庭观念强，博得土著女人的好评，甚至愿意付托终身，因此造成异族通婚现象普遍，生下有华人血统的混血儿。到了1914年，这里大约有100对异族夫妇，生下118名混血儿。政府于是颁布法令禁止华工与当地妇女接触，却无法阻挠异族鸳鸯的结合。这触怒了政府，进一步明令停止招募华工入境，并强行遣返期满的契约华工。尤其是到了1914年，纽西兰政府开始统治萨摩亚独立国，更是雷厉风行，除了获得特许续约者外，一律不能幸免。

      但政府强行遣返华工的政策，引起了工商各界及种植园主的非议，他们认为华人勤奋、守法、节俭并乐善好施，对社会、经济贡献良多，不可或缺。纽西兰政府最终在1920年恢复招募华工。然而在纽西兰政府的统治下，华人备受歧视与压迫，华工契约期满后，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得以续约外，一律强行遣返，在1915至1919年间，共有1254名华工分乘5艘轮船返国。华人不能自由入境，被遣返归国，有的年老病死，因此华人的人数逐年下滑。直至1948年，政府才让华人长期居留，自由选择职业，萨摩亚独立国华人的历史才翻开新的一页。

      新喀里多尼亚位于南太平洋西部，1853年被法国占领，成为法国流放罪犯的殖民地。这里矿产资源丰富，尤以镍、铜与铬储量最多，镍产量与出口量均列世界前茅。1859至1860年，已有华人从广州和澳门入境，充当法国移民家庭的仆役。1870年间，除了原住民外，这里共有4937名法国人和1176名亚洲人，其中约半数是中国人。

      1880年，法国殖民政府企图招募劳工往新喀里多尼亚开采矿产资源，但欧洲人视为畏途，不愿前往；而土著又不能胜任，计划只好束之高阁。1890年，一家投资开采铜矿的法国公司派员去招请2500名中国工人，但遭两广总督等官员以该处水土恶劣，雇主又恶待工人等理由，加以拒绝。

      1902年间，法国人曾从租借地广州湾运送450名中国工人前往新喀里多尼亚，他们是来自雷州及吴川等地的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大力开发这里的铜、镍、锰及钴矿产，输入大量劳工，其中以越南人最多，其次是爪哇人，接着是中国人。自1923年以后，外国劳工逐年增加。

      瑙鲁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南端，盛产磷酸盐，可作为肥料之用，俗称磷肥。自西方殖民国家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掘瑙鲁岛上的鸟粪磷肥以来，中国劳工便随之而来，从事艰苦的采掘生涯。

      1888年，德国占领了瑙鲁，但却忽略了磷肥的经济价值，未加以开采。迨至1900年英国占据欧申岛，并着手开采岛上的磷肥之后，才促成德国加紧瑙鲁的磷肥开采，但由于缺乏劳动力，都宣告失败。1906年，英德两国商议联手开发，由英国的太平洋磷肥公司主持，始见成效。

      1907年，通过汕头德商的招募，成功地招到743名契约华工登船前往瑙鲁。同年较后时期，他们在香港及汕头再次招到857名契约华工。此后太平洋磷肥公司又于1911和1913年先后从汕头装载华工运到瑙鲁。于1907与1913年之间，估计有3000华工到瑙鲁去服劳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澳洲占领瑙鲁岛，接管岛上磷肥的开采事业。初期并无招请华工入境，因缺少劳动力，开采工作难以为继，1921年后，不得不再雇用华工。据统计，在1922与1924年间，入境的华工有916人，出境的有679人。此后仍有华工不断从香港前往瑙鲁。

      契约华工被派往矿场从事艰辛的采粪工作。矿地寸草不生，烈日当空，臭味冲天，工人一层层往下挖，不幸者还得赔上生命，惨不忍睹。1929至1939年间，因华工的辛勤工作，岛上磷肥产量倍增，跃居世界磷肥生产的第二位。据1935年的统计，岛上的契约华工有921人。

      南太平洋地区的契约华工输入，大抵始于1865年的大溪地。此后一批批的华工，源源不断，陆陆续续散布到各岛屿去，直至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概有2万名华工到南太平洋地区去服劳役。以籍贯而论，珠江下游的四邑人最多，其次是客家人，少数是福建人与潮州人。斐济几乎全是广府人；瑙鲁也都是四邑人，尤以台山与恩平人居多；萨摩亚独立国早期华商来自福建厦门，契约劳工则以四邑人居多，尤其是恩平人；至于新喀里多尼亚的华人居民，则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

      华人虽然离乡背井，远离祖国，但仍然心系中华。他们经常汇款回国，接济故乡的家眷或亲人，甚至埋骨异域，依然魂萦故国。在萨摩亚独立国的华人公墓，竖立着台山人陈五福的墓碑，墓碑上刻着以下的文字：龙来千里远，坟墓万年长。正忠报国，理所当然。

      那时期，富有的华人将孩子送回中国大陆念书也是一种风气，如萨摩亚独立国的首富梁槐，就把12岁的儿子梁明远送往广州求学，希望他能感染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美德。梁明远学成归来后，并没有令父亲失望，为当地华社进行了许多公益活动。

战后几十年来，华人社会逐渐发生了蜕变。由于当地人口自然的增长，以及外来新移民的入境，促成了华人人口的激增，社会结构变得复杂，经济活动范围扩大，无论在商界或政坛，人才辈出，更多的华社组织随之冒起。中国与居留地关系的变化，也在华人的思想感情上激起波澜。

      太平洋岛屿的异族通婚现象很是普遍，华人男性与土著或白种人女性的结合，生出了混血华裔，经过好几代的繁衍，其人数大大超过纯血统的华人。据萨摩亚独立国的华人透露，目前纯血统的华人不多，而混血华裔（只会讲萨摩亚语和英语）却超过3万。混血华裔已入籍当地，他们与土著一样，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他们可在政府部门任高职，也可竞选国会议员。一部分华裔在政坛上出人头地，政府中的议长、前司法部长、税收海关部负责议会事务的议会秘书等均为华裔。

      此外，也有华裔担任农业部长、土地部长和财政部长，而当过国会议员的华裔至少有3名。华裔于经济方面举足轻重，他们在银行及私人机构任要职，思想与生活方式，已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尽管混血华裔对先辈已印象模糊，但对中国还怀着淡淡的情愫，并以具有华人血统而自豪。

      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主要与老居民有亲属关系，多从事餐馆业及小商店。而台湾的移民，则投资小型生产企业及经营农场。新移民的到来，为原来单纯的闽、粤籍华人及其后裔添加了新元素，令此处的华社更为多元化。

      在美属萨摩亚（American Samoa，亦称东萨摩亚），二战前很少有华人定居。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有少数台湾人带了一定的财富前来寻找投资商机。接着70年代，又有一批台湾人移入。台湾人多经营种植业、商业及渔业，在华社中，可谓人多势众。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一小部分中国大陆新移民到来，以经商及打工为生。由于这里的居民持美国公民护照，有利于到美国定居，并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新老移民均以此地为跳板，以期有朝一日得以移居美国。据中华总商会1987年的资料所示，美属萨摩亚的华人已有157人，随着近年华人的陆续到来，估计已增至三百余人。

      瑙鲁是小国寡民，20世纪上半叶，到德属瑙鲁开采磷肥的契约华工多达3000人，不过约满离境归国的也多。在澳洲政府统治期间，由于严格限制华人入境，以致华人人口日渐减少。

      汤加是南太平洋的小国，人口只有十万左右。17、18世纪之际，荷兰、英国与西班牙先后入侵，1900年沦为英保护国。由于排斥华人，所以二战前的汤加没有华人的足迹。直至1970年独立后，与台湾建立邦交，才开始有华人移民来此。从1980年代起，华人移民陆续移入，尤其是1989年该国开始售卖“汤加国民护照”之后。除了中国大陆移民外，还有港台新移民，有的已经入籍成为公民。但近几年来，政府已加紧限制移民政策，持有临时工作准证的华人，到期后多数不再给予延长，须返回中国。

      南太平洋的另一小国瓦努阿图，人口只有20多万。17、18世纪之际，葡萄牙、法国与英国的探险家先后航抵该群岛，争相殖民。英法两国终于1906年达致协议，实行两国共管。

      早在清朝末期，即19世纪下半叶，就有华人移民入境，他们主要是给当地的庄园主打工。早期移民多是广东的增城与东莞人。而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混血华裔，已经是第三四代了，他们不会说华语，但少数建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成为华社的领袖。近二三十年来，才开始有大批华人移民涌入瓦努阿图。他们来自中国大陆、港台与马来西亚。新移民包括中国各省县人士，促使华社成员的籍贯多元化。

      密克罗尼西亚属下的群岛，曾先后被葡萄牙、西班牙、英、德、美列强占领，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宣告独立，计有：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及帕劳。这些国家都是小国寡民，人口从两三万到十几万不等，经济落后，人民贫困，所以到来谋生发展的华人也不多。

      新喀里多尼亚是法国的海外领地，这里的华人大多是在战后迁移过来的。早期移民以广东东莞及宝安居多。介于1957年与1963年间，由于大溪地经济衰退，有数百名华人便移居到新喀里多尼亚的首都努美亚（Noumea），他们多是客家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印度支那、中国大陆及港台等地的新移民也陆续迁来。

      在战前，绝大部分的华人移民是契约劳工，他们工作辛苦，薪金低微，备受欺凌，没有人身自由，地位卑微。此外还有少数的自由移民，他们是叫卖小贩、小餐馆业主、小店主、售货员、技工或劳工。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新移民的到来，逐渐冒起了华社中的上层与中层阶级。尤其是来自港台的新移民，他们带来了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经营理念与技术，或投资设厂，从事各种制造业及食品加工等生产企业；或垦殖农场，大规模种植水果生菜，供应市场销售；或组织渔业公司，购置渔船，大量捕鱼，以供应当地市场，或进行罐头加工，远销外国。因此假以时日，便成功地制造了一批企业家及大商家，他们生活奢华，住洋房，出入皆以豪华汽车代步，形成了上层阶级。

      另一方面，一部分契约劳工，合约期满以后，恢复自由身，便弃农从商，或开小餐馆，或经营小商店。由于勤奋节俭，积聚财富，扩大生意，餐馆变得越来越豪华，商店成为大商场，终于摇身一变，从一穷二白的契约劳工，变为腰缠万贯的富翁，跻身上层阶级之林。原籍广东台山的陈茂便是一例，他是1934年的最后一批契约劳工，1937年合约期满后续约，从事各种垦荒种植，累积了丰富的经验。1950年开始自行创业，先是开小餐馆、小商店及制作面包。经过30多年的努力，小商店终变成萨摩亚独立国最大的商场，小餐馆也成为最豪华的餐馆，陈茂于是从一名身无分文的契约劳工，变成为拥有千万美元资产的首富和公认的社会领袖。他曾获得萨摩亚独立国政府授予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为经济、社会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还有一批年轻的华人后裔，头角峥嵘，出人头地。他们有的留学澳洲或美国，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管理与经营方式，学成归国，或继承父业，或自行创业，闯出一片天地，成为当地的富豪。有的回来当律师、医生及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构成上层阶级的一环。有的当公务员，也有的经营出入口贸易、餐馆及服装业等，壮大了中层阶级的行列。

      海外华人定居他乡，有家归不得者，终究必须老死异域，因此妥善安排身后事，便成了大问题。早期移民的身后事，都是由同乡同事草草处理。较后有了会馆或同乡会的组织，才积聚了多人的财力，购置土地，建设公墓，使这些可怜的海外孤魂，得以入土为安。

      萨摩亚独立国就有一个华人公墓，它是由“华人俱乐部”于20世纪20年代购地落成的。这里安葬了300多名华工的尸骨。从墓碑镌刻的文字，可以了解到这些华工主要来自广东台山、恩平、新会、斗门、阳江、三水、开平、海宴、恩邑、惠州及福建福州、厦门和广西、江西等地。墓碑也有一些感人的刻文，如“离开世界西方走，步入蓬莱上扬州”，及“只为求谋来外国，谁知命蹇丧番邦”，刻划了死者虽客死异乡，但仍魂萦故里，或因为不能埋骨故国而饮恨不已的心情。

      华人身处他乡异域，倍感寂寞凄清，因而渴望宗教信仰，祈求心灵宁静与精神慰藉。早在几百年前，基督传教士已经进入各岛屿，成功地向土著传教。而这里的华人也不乏基督教徒，并且经常参与教会的种种活动。可是更多的华人，仍然保有中国的传统信仰习俗。每逢良辰佳节，如春节、中秋节与端午节，他们就会祭拜祖先，并准备丰盛的食物，一家大小共伸庆祝，尤以庆祝春节最为隆重。

      不过，尽管早期的年老华人移民极力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有些社团及厂商，也筹办华文学习班，以让华人子弟有机会学习中文，濡染中华文化，但由于当地环境不利于华文的学习，因此年轻人对进修中文都意兴阑珊，或半途而废，终告徒然。随着老一代华人的消失，中华文化越来越黯然失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世界各地，只要是有华人聚集的地方，就会经常有筹钱建庙的活动。最受华人普遍膜拜的神灵，要数航海神妈祖（天后圣母）、关公（三国时代的关云长）以及观音菩萨。

      当地华人为团结族群，集中凝聚力，以便促进华社的福利事业，及向当局表达心声，争取应得的权益，因此而成立跨方言群的社团组织。如萨摩亚独立国就有“华人公会”，前身是“华侨公会”，其宗旨是促进会员（纯中国血统华人和半中国血统华裔）的和谐与福利；援助会员中之不幸者；捐助慈善事业；促进华人与其他居民的融洽关系。公会也负责管理华人公墓，并于1971年拨资建造了一座大礼堂，进行各种活动。

      美属萨摩亚有中华总商会与中华总会馆，前者由台湾人李天立创建，宗旨是加强华人团结合作，维护华商正当权益，与当地商人或商会组织进行沟通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而后者的首任会长也是李天立。

      瓦努阿图的华人社团则有维拉港中华工会、圣托岛圣都中华工会、瓦努阿图中华同乡联谊总会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瓦努阿图分会。每逢重大节日如春节、国庆等，这些社团都会组织当地华人参加庆祝活动。1997年7月，为庆祝香港回归中国，首都维拉港（Port Villa）的华人举行了瓦国历史上第一次盛大的舞狮游行，反映了当地华人对中国的向心力。社团还资助当地的慈善事业，主办中文学习班及太极拳学习班等。

      汤加的华人社团有华商会、华人联合会、中华会馆及中华促进统一会。这些社团都努力促进华人的团结与福利，组织活动，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及中国国庆日等庆典。而新喀里多尼亚的华人社团则有华人协会与东洋互助会（又称印支互助会）。前者是客家人的组织，后者是印支移民的组织。

      至于说到华人与当地原住民的关，情况则因不同的岛国而异。据萨摩亚独立国的华人反映，政府对华人并无种族歧视的现象，对华人与土著一视同仁，让大家享有同样的社会福利。华人的自由不受限制，可从事各种职业，也可在政府部门任高官厚职。一般人民都与华人友善相处。

      瓦努阿图政府为维护当地人的就业机会，曾限制华人移民入境，除了熟练工人及某些特殊行业的技术人才外，对普通人士一概不发外国人工作准证。不过华人与土著相互尊重，双方关系十分融洽。

      华人在汤加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他们能吃苦耐劳，所经营的批发与零售小本生意，营业时间长、品种多、价格合理、服务周到，所以生意红火，顾客盈门。对比之下，土著的营业乏人问津，最终不得不倒闭，造成了失业率不断上升。政府为了保护土著的商业利益，不得不限制外国人经营批发与零售商品的生意，华商首当其冲，只好另辟蹊径。

      到了2006年11月16日，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Nuku'alofa）爆发了排华骚乱。暴徒群起暴动，以华人商店为目标，强行破门而入，放火烧屋，掠夺财物，约有四分之一的华人店铺被烧毁殆尽，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幸无人命伤亡。

      一年多以后，华人的家园又在废墟中重建起来，且规模比昔日更为宏大。正如当地华商俞珠华所言：“这是首都市区第一个重建的大项目，一定要做好，要比在骚乱中被毁掉的商场高出个档次。”她又说：“这些年，勤劳敢闯的华人为汤加经济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汤加人都念着华人的好。经过骚乱一劫，大家都在反思，相信以后会相处得更好。”

太平洋诸岛国主要以农渔业为国家经济支柱，盛产农产品与鱼类供作外销。近年来则积极发展旅游观光业，为国家带来不少外汇。但由于地处偏远，交通运输不便；人口稀少，人才凋零，尤其缺乏技术工人；市场小，消费力薄弱；基础设施不足，贸易金融萎靡，所以缺少吸引外来投资的魅力，工业仍处于发展中阶段。

      这个地区的华人人口很少，资金不多，所以主要经营小本生意，以开设餐馆、杂货店、百货店及流动商贩为主。有少数来自港台及新马的企业家投资经营小型工业生产，主要集中于食品加工业、日常用品制造业、旅馆及渔业代理公司，也有投资经营伐木业与金融业的。

 萨摩亚独立国华人人口少，其经济活动领域范围也小，以餐馆及杂货业为主。商店多开设在首都阿皮亚（Apia）的法爱阿街上，这里形成了一条唐人街。唐人街的房屋都不高，多是两层木楼，粉刷成白色，光耀夺目，具有华人传统的建筑风格，有些店铺还挂上了中文招牌。也有少数从事出入口贸易、服务业及经营百货商店，销售服装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著名的例子有创立于1950年，1976年正式经营出入口业务的陈茂公司；由5兄弟分别经营建筑、批发、运输、五金及食品业的Ah liki家族集团。此外，台湾商人张秋木，于1970年代初前往阿皮亚创业，先是经营食品业，后扩充营业，开设鞋厂、农场、百货公司，营业规模不小。70年代以来，也有中国大陆、港台及新加坡等地的华商前来开店设厂。

 此处的台湾人较多，他们主要从事蔬菜种植和商业。中国大陆人则多数经营餐馆及小商店。商业中有杂货零售批发业及贸易业至少17家，其中，李天立所属商号3家，潘隆俊所属德法公司亦是较具规模者。由华人所经营的餐馆业约有8家，药业1家，机械、仪器及电子、电器修理厂各1家，还有华人农户约9家。

      此外，在良港帕果帕果（Pago Pago）有4家台湾海洋渔业代理公司，各拥有本身渔船，到远洋捕鱼，卖给美国人开办的罐头加工厂，渔船全是雇用中国船员。另有美籍台湾人鲍氏创建的BCTC纺织公司，招请中国女工，生产针织品及衬衫，出口美国。

 瓦努阿图以农渔业为国家重要经济支柱，主要的出口产品有椰子、可可与牛肉。近年来政府积极鼓励外资前来投资设厂，以期引入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创造就业机会。但成绩并不理想。

      这里的华人主要是从商，经营批发、零售业及餐馆业。首都维拉港的商店林立，形成一条唐人街，唐人街的Rue Carnot，是搜罗便宜货的好所在。商店与餐馆，已扩大到城镇与郊区去。维拉港有海景、富豪及竹苑等中餐厅，由于当地物价昂贵，因此餐费自然不菲。

      华人进出口贸易商收购土产品如椰干、花生及香蕉，建立输出管道及行销网，遍及各地。华人营业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粮食、杂货、百货、食品、五金、家电、建筑、交通运输、旅馆、服装及面包等业，约占当商业领域的80%至90%。此外，也有华人从事开垦农场，种植蔬菜水果，以及伐木业。台湾人曾在圣托岛渔港开设远洋渔船公司，从事捕捞工作，出口外国市场，作为鱼类罐头原料。

 汤加以农立国，农业人口占60%。主要农产品为椰子与香蕉。周围海域鱼类资源丰富，由于缺少资金及人才，渔业仍未臻现代化。工业主要是家庭小型企业，局限于食品加工业及日常用品制造业。不过近年来致力于发展旅游观光业，为国家带来不少外汇。

      汤加的华人来自中国大陆、港台与马来西亚，人数极少，只有区区千余人。但在经济领域里却非常活跃，大都是投资小型企业，分类如下：

      杂货业与百货业：华人经营的杂货店有十多家，零售各种日常生活食品与用品。百货店则售卖服装、鞋袜等物；还有在街边摆卖的小食摊与小摊档，唯市场有限，业者只是赚取蝇头小利，仅足糊口。

      贸易出入口商：共有3家。汤加曾经与台湾建交，所以长期以来，汤加与台湾贸易关系密切，台湾入口货以日用必需品为主，包括加工食品、塑胶品、纺织品、成衣、钢铁及金属制品等等。汤加出口台湾的产品则以椰子为主。但华商却只凭接单进货，未能主动开拓市场。

      餐饮业：由华人所经营的餐馆有7家，计有：莉园、广东、东华、君子与翡翠等，多兼营外卖，彼此竞争激烈，利润微薄。

      旅游及娱乐业：华人经营的旅馆有3家，占当地市场的7%左右。因观光旅客不多，乃接受长期租户兼营餐厅，勉力支撑。华商经营的夜总会则有2家。

      银行业：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雷贤雄与雷贤生兄弟与当地政要合作投资，创设马婆金融银行分行，服务网遍及机场、港口及离岛，占汤加银行业务的三分之一。

      其他行业：华人从事采购海参烘干加工外销者与日俱增，由于香港、东南亚及美国需求量大，因此利润可观。

      自汤加与中国建交后，中国政府便陆续派遣援建人员，协助承建汤加国内的庞大建筑工程，中资公司也进入汤加国内发展，如中资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便于2004年9月进场，与汤加最大的私营企业汤加海岸线公司开展移动通讯技术合作，提供更新移动通讯设备及技术服务，并计划开展手机增值业务服务。

  马绍尔群岛农渔业人口占劳动人口21%。主要农产品有椰子、香蕉与马铃薯等。四周海域渔产丰富。为了吸引外资前来投资，政府不惜宣布多项优惠措施，包括投资移民无需经过居留阶段，就可取得合法身分与居留权。近年来，政府也积极扩建机场，改善航空与陆路设备，以发展旅游业。

      这里的华人大多聚居在首都马朱罗（Majuro），主要从事杂货业、餐馆业与流动小商贩。华人的刻苦耐劳，善于经商，使他们占有优势。在政府官员的眼中，中国人做生意十分厉害，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商业技能。他们与马绍尔当地人开设的生意竞争激烈。同时，华商只愿意雇用亚洲人，以致断了不少当地人的就业机会，因而遭受排斥。

      当地有数家中国餐馆，例子有旺海轩（位于旧码头，由台湾人开设）、优力佳餐厅（Uliga Restaurant，位于市中心码头边，也是台湾人开设的中华料理餐厅）、莫妮卡（Monica，女老板是中国大陆人）、东方餐馆（位于政府大楼旁）。另外还有一家中式餐馆，设在台湾人经营的长岛旅馆（Long Island Hotel）内。

      华人投资开设的大型旅馆有2家，即马绍尔岛名胜（Marshall Island Resort）和长岛旅馆。另有一家台湾人经营的Uliga Inn，位于码头边，房间虽小，但很干净，设备齐全。

      马绍尔与中国的邦交反复无常，摇摆不定。不过在此处投资的中资企业公司有上海水产总公司与上海林太集团。前者在马绍尔群岛及基里巴斯都有船队，而且在马绍尔群岛已经建了一座水产品加工厂，投资庞大。后者经营的覆盖面更广，遍及帕劳、塞班、马绍尔、密克罗尼西亚、基里巴斯（Kiribati）都有船队，而且设备比较先进，采取卫星监控与卫星联络。

小国帕劳以农渔业为国家主要经济来源，农产品有椰子、芋头及树薯等。渔产丰富，吸引了美国与日本等国来此开设渔业公司，进行捕鱼与鱼类加工企业。近年来也致力于发展观光事业。

      这里的华人从事杂货零售业、百货店、小摊贩、农业种植及养殖渔业等。

      帕劳自1981年独立后，便与台湾维持良好外交关系，以迄于今。台湾派来农技团，教导当地人种植蔬菜与杂粮，台商也投资发展渔业，兴建高级饭店和度假村。目前当地最大的饭店是台资的帛琉休闲饭店，另一家台资经营规模较大的是凯堤大酒店，其他各级旅馆则有十余家。

该国经济也是以农渔业为主。鱼类为主要的出口外销品。其大自然与海洋的景观很适宜发展观光事业。

      华人主要是从事批发与零售、餐馆、旅馆、娱乐事业和经营农场。经营较成功的华商，年收入达数十万美元，一般雇员的月薪约为500美元。

      台湾渔业公会曾与该国海事会签订渔业合作协定，以允准台湾渔船前往该国海域作业。另有鼎鸿海洋企业公司投下巨资，在该国扩展渔业据点。中资的中国中水公司在此地也设有分公司。

  图瓦卢小国寡民，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万余人。原为英国殖民地，1978年独立，并与台湾建交。此处的华人只有数家，大多聚居在首都富纳富提（Funafuti）。

      当地的华人袁威廉（William Yuan）夫妇经营杂货兼小型餐馆及录影带出租店，生意颇佳。另有来自香港的冯小姐（Julia Fong），独立经营小型超市，亦发展得相当不错。

 这里的华人有5000余人，来自印支以及中国大陆，其中以客家人居多。他们大都聚居在首都努美亚，开设餐馆、食品店、工艺品商店及超级市场等，也有的从事地产生意。华人勤奋节俭，成功人士大有人在，他们非常富裕，且与当地政府各部门关系密切。年轻一代的华裔，在当地完成中小学教育后，多负笈法国，学成归来后，或接管家族生意，或在政府开设的银行与企业公司任职。他们绝大部分只会说法语及英语，不懂得中文。

  与其他洲的情形一样，大洋洲契约华工的命运也是悲惨的，有些不幸客死异乡，死无葬身之地；有的契约期满之后，被强迫遣返中国；幸运的则留下来，恢复自由身，在生活较为安定之后，有些华人便娶当地妇女为妻，繁衍了新生代的混血儿。经过两三代之后，混血儿都被同化了，他们当中，有的秉承了父系方面的勤俭刻苦美德，发奋图强，终于出人头地，在当地商界与政界大放异彩。

      而今日的中国大陆与港台新移民，则跟以往的华人移民不同，他们当中，有的文化水平较高，经商经验较丰富，也有较丰厚的财富，他们的到来，不但使华人人口增加，而且也改变了当地华社的结构，阶级的分化更为显著，经济活动的圈子也更加广泛了